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預刊）

第〇本，第〇分

出版日期：民國〇年〇月

唐宋時期江西地區水路交通—— 以鄱陽湖為中心

吳修安*

本論文在重新探討鄱陽湖形成與演變的基礎上，對唐宋時期江西地區的水路交通進行考察。唐宋時期江西地區的水路交通主要受到內外兩個因素的影響，內部因素是鄱陽湖的形成與擴張，改變了鄱陽平原的水文環境，新形成的湖泊與入湖三角洲水系，成為水路交通發展的地理基礎。外部因素則是全國交通區位的轉變，政治中心逐漸東南移，由長安、開封，最終移至臨安，江西的交通優勢漸增。唐中後期，洪饒間的河湖水文已初步構成水路網，其中，擔石湖—贛江主泓道與信江鄒子港汊道—擔石湖—贛江趙圍汊道成為兩條南北水路交通線的組成部分。北宋時，鄱陽湖—贛江吳城山汊道取而代之，但湖水消退後，贛江主泓道仍肩負主要航運功能。南宋遷都臨安，信江鄒子港汊道—鄱陽湖—贛江趙圍汊道重要性大增，為東西水路交通的主要路線之一。最終形成以南康軍、隆興府與餘干縣為頂點的三角形水路交通網，北通長江，西南走贛江，東南接信江，串連全國水陸路交通。鄱陽湖隨季節消長的特性很大程度影響該地水域的航行，春末秋初湖水泛漲時，波濤洶湧的湖水甚至會危及航行安全，船隻則會避開湍急的河道；秋末春初湖水消退時，分流汊道水位大幅降低，甚至不通船舶。而贛江上游和中下游的航行條件則有所不同。

關鍵詞：唐宋時期 江西 水路交通 鄱陽湖 贛江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壹・前言

鄱陽湖的形成與擴張是歷史時期江西最重要的自然環境變遷，它的出現不僅形塑新的生態景觀，也對湖區及其周邊的交通、經濟與社會等各方面帶來深刻衝擊。然而對於鄱陽湖形成所造成的影響，尚未得到學界應有的關注。就水路交通而言，湖泊水域與河流水道為船舶提供航行空間，是直接影響航運發展的重要地理基礎。而就在唐宋時期，因為鄱陽湖的形成與擴張，鄱陽平原上出現許多新的湖泊水域與河流汊道，這樣的水文變遷必然會對江西水路交通發展帶來新的影響。對此，現行與江西水路交通相關的研究並未觸及，多數學者聚焦於鄱陽湖—贛江與信江—袁水航路在南北與東西交通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尤其是前者與大庾嶺路相關聯，事涉中國南北交通，為學者主要關注的焦點。許懷林更進一步提出，到了南宋時期，江西形成以贛江為縱軸、信江和袁水為橫幹，以水運為主的大十字形交通網絡。但這些論著對於水路交通的路線著墨不多，僅粗略勾勒行經的河流、湖泊與沿途作為港埠的州縣治所，舟船是經由哪些航線穿越鄱陽湖與入湖河道、州縣治所以外的停泊地點以及鄱陽湖與贛江等河流的航行條件等均尚未有充分的考察。整體而言，學界對唐宋時期江西水路交通的理解仍相當模糊，特別是對鄱陽湖及其周邊入湖河道的實際狀態。¹ 因此，本文將以唐宋時期的鄱陽湖及其周邊為核心，疏理在鄱陽湖形成與擴張之下江西水路交通的演變。透過舟船航行路線的復原、停泊地點的考訂，以及河湖航行條件的分析等，儘可能接近當時江西水路交通的實際狀態。據此，對不同地域空間之間人與物循水路移動的分析（如航線、航程、轉運地點、船舶大小等等）將有所本。這除了有助於瞭解當時江西完整的交通狀況，及其在南北水路交通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

¹ 由於研究視野，對唐宋時期南北水陸路交通的考察雖涉及鄱陽湖及其周邊水路，但一般而言較為粗略；而以唐宋時期江西為範圍的水路交通相關論著也沒有詳實的考察。參見許懷林，〈“舟船之盛，盡于江西”——歷史上江西的航運業〉，《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1期：15-21；沈興敬主編，《江西內河航運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頁26-53；許懷林，《江西史稿》（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頁145-150, 328-331；陳金鳳，《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182-185；許懷林，《江西通史·北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167-179；許懷林，《江西通史·南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頁274-280；宋三平、張濤，〈論兩宋江西地區的交通及其影響〉，《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0.6（2009）：98-103。

將為唐宋時期江西乃至整個東南地區之人口遷徙、訊息傳遞、貨物運輸、文化傳播與地域發展等領域提供更為清晰而堅實的研究基礎。²

東晉南朝時期彭蠡湖尚未擴張至松門山以南的鄡陽平原，贛江由豫章郡循今日贛江北、中支東北流，至鄡陽縣附近轉而西北流，經松門山北進入湖口地塹，最終注入彭蠡湖，彭蠡湖再向北匯入長江。由嶺南越大庾嶺至南康郡後，循此水路即可乘舟順流而下直抵建康。這段航程中，最危險的航段有二：一是南康郡與廬陵郡之間的贛石之險，當時「贛石水急」，「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導致「出船甚難」，「行旅者以為難」，只有當江水上漲數丈，「巨石皆沒」，才能順利航行。³ 一是湖口地塹的彭蠡湖水域，尤其長嶺一屏峰以南，嬰子口以北，在春末秋初湖水泛漲之際，該水域的湖流與氣候變化多端，嚴重影響航行安全，因此促使宮亭廟信仰由山神信仰轉變為能「分風擘流」的航運神信仰。⁴

到了唐宋時期，由於鄱陽湖的形成，鄡陽平原上的河流水系出現了重大的變化。是時，隨著泥沙含量的增加，長江水位逐漸攀升，受到江水的頂托與倒灌，彭蠡湖水開始越過松門山，平原顯著朝湖泊化發展。唐代前、中期湖水沿松門山—四望山—棠蔭山—康郎山—線的河道擴張，洪饒交界處的沖積平原陸續淪陷為擔石湖。到了宋代，湖泊水域進一步向東西兩側擴大，形成後世所熟知的鄱陽湖。而隨著鄡陽平原的湖泊化，原先流經平原匯注於贛江的諸河流水系也發生變化：湖泊的形成，導致河道侵蝕基面的抬高，使得舊有河道水流趨緩，形成淤積，於是贛江等諸河流在入湖三角洲都出現若干分流河水的汊道。其中，贛江的分流汊道有二：一是東向經趙圍注入鄱陽湖，形成於唐中葉以前，是今日贛江南支的前身；一是由吳城山北流入湖，形成於唐中葉，為今日贛江主支。信江（餘干水）也有二條分流汊道：一是鄔子港汊道；一是在餘干縣附近分汊北流注入樂安江。⁵

² 誠如嚴耕望先生所言：「交通發展為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之基礎。」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序言·總目·第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序言〉，頁1。

³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00，〈盧循傳〉，頁2634-2636；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1，〈高祖紀〉，頁5。

⁴ 參見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6），頁33-34。

⁵ 關於鄱陽湖的形成與擴張，參見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15-57。

吳修安

因此，原先以贛江匯合諸河流北上注入彭蠡湖的水系，由於彭蠡湖擴張至松門山以南形成鄱陽湖，演變為以鄱陽湖匯聚諸河流來水，而諸河流在入湖三角洲各自形成若干汊道的水系。這個水系以鄱陽湖為中心，與周邊匯入湖泊的河流及其汊道在原先鄱陽平原上構成一個水道網絡，新的交通路線於是應運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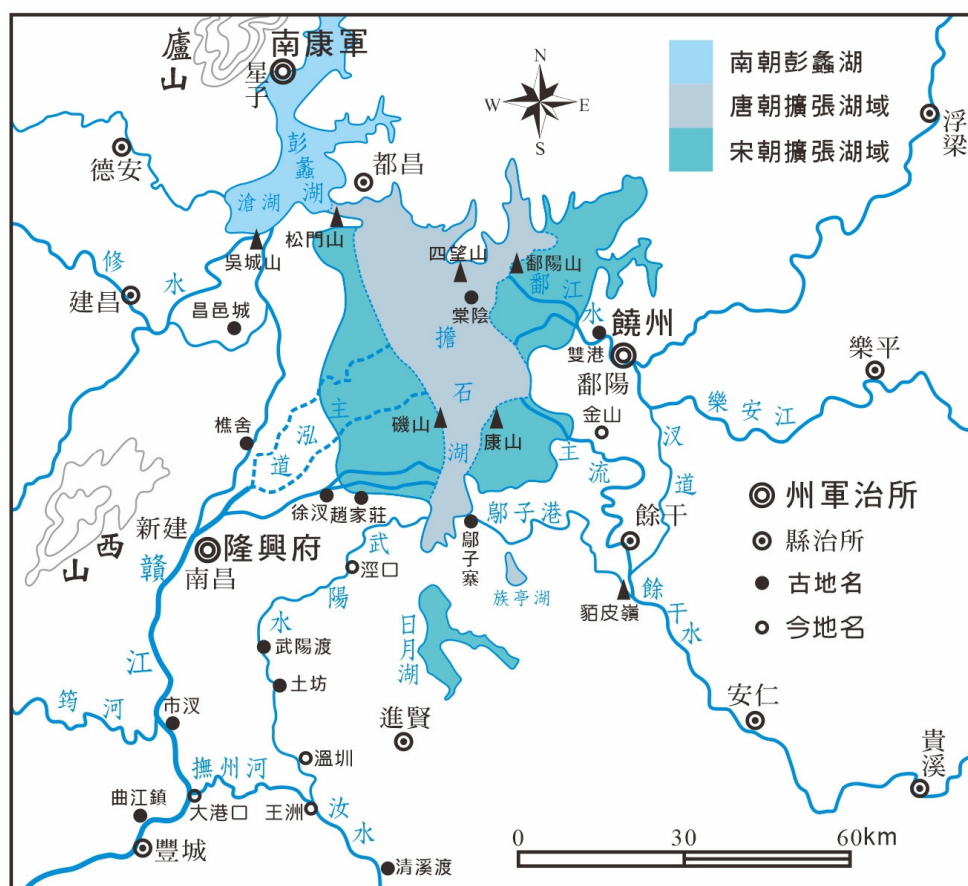


圖 1：唐宋時期鄱陽湖與入湖三角洲水系示意圖

（本圖為筆者繪製，行政建置斷代為南宋嘉定元年〔1208〕，以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相關圖幅為底圖）

貳·唐五代鄱陽湖水路交通網的初步發展

在整個水道網絡中，鄱陽湖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尤其是松門山以南的水域，透過鄱陽湖的連繫，水路網才得以形成。至遲到了唐中期，松門山以南的擔石湖已是舟船航行的主要水域。大曆詩人竇叔向與劉長卿在安史亂後避亂南下時，就曾舟行於擔石湖，留下〈過擔石湖〉與〈夕次擔石湖夢洛陽親故〉的詩作。⁶ 元和四年（809），李翱由洛陽前往嶺南擔任幕職時，舟行由餘干縣「直渡擔石湖」，經洪州南下。⁷ 釋貫休於咸通年間（860-874）旅居江西時，以及韋莊於大順二年（891）由越中遊江西、湖南時，亦皆曾航渡鄱陽湖，先後留下〈春過鄱陽湖〉與〈泛鄱陽湖〉的詩作。⁸ 其中李翱在〈來南錄〉中所記錄的南下路線，首度明確證實信江水路與贛江水路可透過擔石湖串聯在一起，其云：「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⁹ 「高溪」與「漳江」分別指的就是今日的信江與贛江，¹⁰ 亦即李翱是從玉山縣舟行信江，順流而下至擔石湖，再由擔石湖舟行贛江，逆流而上至洪州。李翱是經信江入湖三角洲上新形成的汊道——鄔子港——抵達擔石湖，渡擔石湖後，再舟行贛江南支至洪州。¹¹ 這一條

⁶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據宋刊本配明隆慶胡惟新刊本影印），卷 293，〈詩一四三·行邁五〉，頁 1494；劉長卿，《劉隨州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235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據畿輔叢書本排印），卷 6，頁 64；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213-214。

⁷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內府原刊本影印），卷 638，〈李翱五·來南錄〉，頁 6442-6443。

⁸ 釋貫休撰，陸永峰校注，《禪月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卷 7，頁 158；韋莊著，聶安福箋注，《韋莊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7，頁 264。

⁹ 董誥等，《全唐文》卷 638，〈李翱五·來南錄〉，頁 6442-6443。

¹⁰ 按「高溪」指的就是「餘水」，即今日的信江，費宏（1468-1535）在〈題四府嚴公所繪廣信地理圖〉載云：「水貫其中，清澈湍駛，朱文公所謂高溪也。」雍正《江西通志》亦載云：「上饒江，在府城北，會諸溪水，下經弋陽、貴溪流入饒州府境。一名高溪，見朱子集。」費宏撰，吳長庚、費正忠校點，《費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 20，頁 719；謝旻等監修，雍正《江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3-51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1，〈山川·廣信府〉，第 513 冊，頁 371。

¹¹ 關於李翱「自玉山至湖」與「自湖至洪州」所走水路的考證，請參見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 41-42, 44-45。

水路交通線可能也是其他渡湖者所走的路線。竇叔向與劉長卿雖未明言渡擔石湖前後的行旅起訖地點，但前者「曉發漁門戍，晴看檐石湖」的記載，是描述由贛江南支入湖口橫渡擔石湖的情景。¹² 而後者則多次進出江西，舟行往來洪州與鄱陽、餘干之間，¹³ 其在〈負謫後登干越亭作〉載云：「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查查鍾陵暮，悠悠鄱水春」，¹⁴ 乘舟至餘干後，登干越亭，而且目的地直指洪州，與李翱的經歷類似，這顯示〈夕次擔石湖夢洛陽親故〉可能是作於洪州與餘干間的水路旅途中。而韋莊在江西境內行旅時，亦在干越亭前的琵琶洲與南昌留有詩作，¹⁵ 〈泛鄱陽湖〉可能也是航行在這條水路上時所作。因此可以推斷擔石湖的形成對這條水路的出現有關鍵性的影響。

贛江南支—擔石湖—鄒子港水路的出現使得信江水路的重要性上升，李翱的例子顯示，唐後期信江水路已被納入新出現的南北水路交通路線。這條水路的興起與隋代大運河的開鑿密切相關，尤其是江南運河的疏鑿。東晉南朝時期，建康與嶺南的水路交通往來多循長江—彭蠡湖—贛江，不見有走信江水路的記載。到了隋唐時期，由洛陽舟行通濟渠—淮水—邗溝水路抵達揚州後，除了可舟行傳統的「上元、西江」水路（長江—彭蠡湖—贛江）南下之外，亦可循李翱所行路線，渡江至潤州走江南運河—錢塘江—信江—擔石湖接贛江水路南下。而擔石湖的形成，使得這條新形成的南北水路交通線得以循信江順利連通贛江。除了作為南北水路交通路線的一段，信江水路也是區域內交通往來的常行路線。劉長卿在肅代之際旅居江西時，曾「沿流附客船」，走信江水路「歸弋陽山居」，¹⁶ 可知

¹² 關於漁門戍的位置參見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 45。

¹³ 《唐五代文學編年史》認為乾元元年秋，劉長卿貶南巴尉，至饒州，後歸赴蘇州重推；乾元二年（759）是在蘇州，重推後於上元元年春，貶南巴尉，使牒留洪州待進止；同年十一月自洪州返回蘇州，隨即應辟宣州鄭靈之幕；上元二年二月，因劉展之亂奔至饒州，同年秋返回蘇州；大曆九年秋，劉長卿被貶為睦州司馬，先自鄂州沿江而下，經江、和州至常州別業；同年冬赴睦州。參見傅璇琮、李一飛、陶敏，《新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中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2012），頁 34, 40, 51-52, 56, 60, 62, 65, 186。而儲仲君則認為劉長卿曾在乾元二年、上元元年至寶應元年間（760-762）與大曆十一年（766）途經或謫居江西。參見劉長卿，《劉長卿詩編年箋注》，頁 185-233, 404-412。

¹⁴ 劉長卿，《劉隨州集》卷 6，頁 65；劉長卿，《劉長卿詩編年箋注》，頁 192-194。

¹⁵ 有〈饒州餘干縣琵琶洲有故韓賓客、宣城裴尚書、修行李侍郎舊居，遺址猶存，客有過之感舊，因以和吟〉、〈南昌晚眺〉、〈洪州送僧遊福建〉等詩作，韋莊，《韋莊集箋注》，頁 267, 269, 393。

¹⁶ 劉長卿，《劉隨州集》卷 6，〈歸弋陽山居留別盧邵二侍御〉，頁 39；劉長卿，《劉長卿詩編年箋注》，頁 219。

當時信江水路上已有專門搭載旅客的船隻。同一時期，李華亦曾溯流而上，「自餘干溪行，經弋陽至上饒」；¹⁷ 獨孤及則曾「下弋陽江」，自玉山舟行順流而下。¹⁸ 永泰元年（765），朝廷還因餘干與弋陽間，「地相去濶遠，山水迴合，羣盜潛藏，舟行船汭，人不自保，寢以成俗，久而逾甚」，而「就貴溪口置貴溪縣」。¹⁹ 可見在唐中期舟行信江水路已是常態。

另外，洪州與饒州之間的贛江水路（北、中支）與鄱江水路亦透過擔石湖被串聯在一起。至遲在唐中期，這條水路就已經形成，其路線是由洪州東北走贛江主流（今北、中支）水路「屈曲二百六十里」至擔石湖，渡擔石湖後，再東走鄱江水路「一百七十里」至饒州。²⁰ 關於舟行這條水路的確切記載，目前僅見於唐人傳奇小說《博異志》中的〈許漢陽〉。文中描述許漢陽於「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江波急，尋小浦路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²¹ 雖未明確載明所經為擔石湖，但當時湖區是河湖交錯並存的水文環境，河流景觀地貌是常態。²² 這是另一條東西向橫渡擔石湖的水路。

而在新形成的水道網絡中，南北縱向穿越鄱陽湖仍是最主要水路交通線。往北可經由湖口地塹的彭蠡湖進入長江水路，往來長江中下游，進而循大運河北上汴洛；往南則可走贛江等諸河流至江西各地，進而越大庾嶺至嶺南。這一水路是東晉南朝時期長江—彭蠡湖—贛江水路交通的延續，因彭蠡湖向南擴張，而有了新的發展。其路線大致如下：

北段水路（湖口地塹水域）：主要延續東晉南朝的彭蠡湖水路，由長江經湖口進入彭蠡湖後，略過湖域北部中心的大孤山南下。貞元十年（794），顧況由

¹⁷ 計有功撰，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唐詩紀事》（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21，〈李華〉，頁 308。

¹⁸ 按：獨孤及有〈庚子歲避地至玉山訓韓司馬所贈〉、〈下弋陽江舟中代書寄裴侍御〉、〈題思禪寺上方〉與〈早發若峴驛望廬山〉等詩；獨孤及，《昆陵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659 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上海涵芬樓景印亦有生參校刊本影印），卷 1，頁 10-11。

¹⁹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107，〈江南西道五·信州〉，頁 2155。

²⁰ 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 40-41。

²¹ 李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422，〈龍五·許漢陽〉，頁 3433-3435。

²² 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 49-50。

饒州貶所舟行經彭蠡湖返回蘇州時，曾留下「大孤山盡小孤山」的詩句；²³ 開成元年（836）孟夏，李德裕「剖符淮甸，道出蠡澤」，亦舟行途經此地，因此作了〈大孤山賦〉。²⁴ 可知大孤山是進出彭蠡湖必經之地。據《太平寰宇記》的記載：

彭蠡湖西灣，夏秋水漲，商徒縈紆，牽舟循繞，人力疲勞，號曰西疲灣。……又有神林灣，在湖西北。灣中有林木，林下有廟，商旅多於此阻風波，禱廟祈福而獲前進，由是名焉。又有女兒浦，內有女兒廟，禱祈亦有靈應，即未詳所置。²⁵

據此西灣、神林灣與女兒浦為航線所經。按：西灣「去（星子）縣西二百餘步」；神林灣在星子縣「東門之外」，「去縣東五里」，林下之廟為宮亭廟，即今廬山市東北的神靈水庫；²⁶ 女兒浦「去府治三十五里，臨宮亭湖，與大孤山相對」，在今廬山區姑塘鎮附近。²⁷ 三地皆在廬山山麓的彭蠡湖西岸，亦即船隻由湖口進入彭蠡湖後，向西南航行，略過大孤山直抵湖西女兒浦附近水域，再循湖西岸南下，經神林灣至星子鎮所在的西灣，再向南航行越過嬰子口。

²³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11，〈江南西道九·江州·德化縣〉，彭蠡湖條下引顧況詩，頁 2255。按顧況還有〈從江西至彭蠡入浙西淮南界道中寄齊相公〉一詩，可知其曾途經彭蠡湖，參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 254，〈詩一百四·寄贈八〉，頁 1278。

²⁴ 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別集卷 2，〈賦下·北歸六首·大孤山賦并序〉，頁 442-443。

²⁵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11，〈江南西道九·江州·德化縣〉，彭蠡湖西灣條，頁 2255-2256。按：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複製重印），卷 75，〈地部四十·灣〉引《尋陽記》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劉緯毅以「未署撰人，不知所從，姑另錄之，待考」，而黎傳紀則以「其文所記間有可考者，多為隋唐以前故事，蓋出自晉宋尋陽舊乘」，認為此《尋陽記》為南朝宋山謙之所纂，然《太平寰宇記》所載並未註明引自何書，《尋陽記》是否為山謙之所纂，待考。參見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 253；黎傳紀、易平，《江西方志通考》（合肥：黃山書社，1998），頁 181-183。

²⁶ 按：據曹彥約的記載其湖莊在：「東門之外神林浦之東，宮亭廟之北」，亦即宋代宮亭廟在神林浦東南。曹彥約，《昌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7，〈書·湖莊創立本末與後溪劉左史書〉，頁 95；陳霖修，陳徵等纂，正德《南康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3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據明正德十五年刻本影印），卷 2，〈山川·星子縣〉，頁 33-34。

²⁷ 馮曾修，李汛纂，嘉靖《九江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36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2，據明嘉靖七年刻本影印），卷 2，〈方輿志〉，頁 88，114；雍正《江西通志》卷 34，〈關津〉，第 516 冊，頁 169。

中段水路（嬰子口至南昌間）：此段水路有較大的變化，船隻越過嬰子口後，可分為二路：一是東南行，經松門山與都昌西山、南山間的水道進入擔石湖；一是西南行，渡滄湖，由吳城山進入贛江汊道（今贛江主支）。後者是唐後期才出現的新航路，從吳城山循贛江汊道溯流而上，經樵舍抵達洪州城。目前所知僅李德裕於開成元年夏天循此水路出「滄湖口」北上，²⁸ 然從「龍王本廟」在樵舍，且「遺構最古」的記載，北宋之前，這條水路上已有不少行旅。²⁹

前者則是東晉南朝時的舊航路，唐五代時期大多舟船仍循此水路交通來往，經擔石湖可分別循贛江、信江與鄱江溯流而上。其中，贛江指的是前述作為洪饒間水路的贛江主泓道，循此由擔石湖「水路屈曲二百六十里」至洪州，這是延續東晉南朝以來的傳統水路。光化三年（900）六月，錢珣被貶為撫州司馬，「秋八月，自襄陽浮而下」，³⁰ 在〈江行無題一百首〉中寫下這段旅途的景況。從其詩句可以推測錢珣自襄陽浮江而下抵達潯陽後，由湖口進入彭蠡湖，南行過松門山，走贛江主流，經龍沙至洪州，再南下前往撫州。³¹ 贛江主流水路較為屈曲，但由於流量大、水深夠，尤其是在枯水期這一優勢更為明顯。因此雖然當時大多數舟行於長江與洪州間南來北往的記載未明確載明其所走贛江水路為何，然而可以推測他們所走大抵應是贛江主流。³²

由信江溯流而上可至信州。咸通年間，弋陽丞張仲岳為護送其母親的棺木回老家蘇州，由弋陽「整舟楫，浮滄浪，過九江，順流而東行」。³³ 顯然是走信江水路，經擔石湖順流而下，至江州入長江水路，然他所舟行的是信江主泓道，還是鄔子港汊道已不得而知。

²⁸ 李德裕，《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 2，〈賦下·北歸六首〉，頁 441-442。按：考證見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 53-54。

²⁹ 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篇（三卷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中，頁 83。按：相關考證見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 53。

³⁰ 李昉等，《文苑英華》卷 708，〈序九·舟中錄序〉，頁 3648。

³¹ 按：有「去指龍沙路」、「匡廬不可登」、「長恨隔龍沙，今日滕王閣」、「路好過松門」、「平湖五百里」、「身到章江日」、「願飲西江水」、「湖口分江水」、「潯陽江畔菊」等詩句。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712，〈錢珣·江行無題一百首〉，頁 8190-8197。

³² 據筆者收集的資料，隋唐五代時期，曾經舟行於長江與洪州間水路的記載有蕭銑舟師、吉州司馬孟簡（元和年間）、杜侍御（大中年間）、符載、廣陵士人與徐璠等。

³³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117。

而由鄱江溯流而上，目的地則是饒州。天寶九年（750），李白在潯陽郡送其弟李昌峒赴任鄱陽郡司馬時，曾賦詩云：「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松門拂中道，石鏡回清光」，³⁴ 可知當時由江州舟行前往饒州，就是走松門山附近的水域。至德年間（756-758），戴叔倫與宋垓的家族為避永王璘之亂，於「京口附商客」，舟行溯長江而上，最終抵達饒州。他在三十年後寫給宋垓的詩中描述了這段旅程：「潮盡爐峰出，石壁轉棠陰，鄱陽寄茅室。」³⁵ 按：爐峰指廬山香爐峰，石壁即石壁山，在都昌縣「西南一十一里，傍臨清江」，對面即松門山，棠陰則是湖中的棠陰山。³⁶ 亦即戴叔倫一行人是由長江轉入彭蠡湖，經松門山與石壁山之間的水道進入擔石湖，經過棠陰山後，入鄱江至饒州。前述顧況於貞元十年由饒州舟行返回蘇州，其詩作雖未詳指所走水路，但從他途經大孤山與〈從江西至彭蠡入浙西淮南界道中寄齊相公〉一詩推測，其應是舟行鄱江入擔石湖，北上經彭蠡湖接長江水路。開運二年（南唐保大三年，945），閩主王延政出降南唐後，被遣送金陵，途中曾泊船鄱陽，³⁷ 其所走應該也是鄱江—擔石湖水路。

上述這四條穿越湖區的南北向水路與前述二條橫渡擔石湖的東西向水路，在鄱陽平原上初步形成水路縱橫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中，西南角的洪州，由於地處贛江入湖三角洲頂端，匯聚了通往贛江中上游與嶺南的諸多水路，成為鄱陽湖流域水路交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南段水路（南昌以上）：主要循贛江南行，至吉州與虔州，可再越大庾嶺至嶺南，或轉貢水至雩都縣瑞金場，再越嶺至汀州。亦可由贛江轉汝水（今撫河）至撫州，或由贛江轉袁水至袁州。

就前者而言，開元年間（713-741），孟浩然曾遊歷江西至虔州，其〈下贛石〉詩云：「贛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間。……榜人苦奔峭，……登艫目自閑。暝

³⁴ 李白撰，瞿蛻園、朱金誠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18，〈尋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頁1060。按：《李白全集編年注釋》認為此詩作於天寶九年夏秋之際剛到潯陽之時，參見李白撰，安旗等注釋，《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0），頁921。

³⁵ 彭定求等，《全唐詩》卷274，〈戴叔倫·撫州對事後送外生宋垓歸饒州覲侍呈上姊夫〉，頁3113-3114。按：本詩最初收入王安石選編的《唐百家詩選》。

³⁶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11，〈江南西道九·南康軍·都昌縣〉，石壁山條，頁2263；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道光二十九年懼盈齋刻本影印），卷23，〈江南東路·饒州〉，景物門下，頁1043-1044。

³⁷ 江少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48，〈占相醫藥一·閩主延政〉，頁636-637。

帆何處宿，遙指落星灣。」³⁸ 可知其是由虔州舟行贛江而下。天寶九年，鑒真由廣州北返揚州，過大庾嶺後，曾在虔州、吉州、廬山與江州等地短暫停留，《唐大和上東征傳》載云：「次至吉州，僧祥彥於舟上端坐」，³⁹ 可見鑒真一行是乘舟循贛江順流而下。貞元十二年（796）夏，符載由江州舟行南下前往嶺南，途中因「屬船隘熱劇，飲食江水」，在「度廬陵百餘里」後染病，而於虔州停留養病。⁴⁰ 元和四年，李翱在走信江—擔石湖—贛江南支水路抵達洪州後，亦舟行循贛江水路南下經吉州至虔州，再越大庾嶺至嶺南。⁴¹ 元和十五年（820），襄陽節度使孟簡被貶為吉州司馬，途中曾「乘舸」邀請正由袁州北返長安的韓愈於蕭洲（即蕭灘鎮，今樟樹市臨江鎮）相見，⁴² 可知孟簡是舟行贛江，溯流而上至吉州。唐末，韋莊在遊歷江西時，曾有〈撫州江口雨中作〉詩云：「江上閑衝細雨行，……猶指廬陵半日程。」⁴³ 據此知韋莊是溯流而上，舟行途經撫州江口，前往吉州。又《稽神錄》記載了一則神怪故事：廣陵士人為妖物所糾纏，「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塗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⁴⁴ 由廣陵經洪州，舟行贛江前往玉笥山。這些例子顯示，在唐五代時期，贛江水路上的舟船往來極為頻繁。

由虔州亦可舟行貢水而上，據《元和志》的記載，汀州「西至虔州水路相兼一千二百里」，⁴⁵ 亦即兩地之間的交通有部分是依靠水路，而一直到 1960 年

³⁸ 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中，頁 204。

³⁹ 真人元開著，汪向榮校注，《唐大和上東征傳》（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76-79。

⁴⁰ 李昉等，《文苑英華》卷 679，〈書十三·贈答下·寄南海王尚書書〉，頁 3499。

⁴¹ 董誥等，《全唐文》卷 638，〈李翱五·來南錄〉，頁 6442-6443。

⁴²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7，〈碑記·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頁 554。按：《輿地紀勝》引《韓文公集》注云：「郡舊名蕭灘鎮，又名蕭洲。韓文公自袁州還京師，孟簡乘舸邀我於蕭洲。」《太平寰宇記》載清江縣「本吉州蕭灘鎮，偽唐升元年中以其地當要衝，升為清江縣。」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34，〈江南西路·臨江軍〉，景物門上，頁 1474；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6，〈江南西道四·筠州〉，頁 2121。

⁴³ 韋莊，《韋莊集箋注》卷 7，頁 279。

⁴⁴ 李昉等，《太平廣記》卷 367，〈妖怪九·廣陵士人〉，頁 2918。按：據《太平寰宇記》，玉笥山在吉州新淦縣「南六十里」，即今峽江縣西北。

⁴⁵ 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29，〈江南道五·福建觀察使〉，頁 722。

代，瑞金縣治以下的綿江皆可通航，物資運送皆仰賴水運。⁴⁶ 因此可以合理推測，唐五代時期，由虔州可舟行至雩都縣的瑞金場。

上述贛江水路所經有二個地點值得注意：一是撫州江口，直到南宋，撫河的主流仍在豐城縣東北的大港口匯入贛江，⁴⁷ 這也是唐五代舟行往來撫州的水路。唐末，沈彥在〈碎碑記〉記載他經此水路前往撫州的過程：光啟元年十二月（886），「客鍾陵，由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久愆雨，水泉將涸，風不便行，維舟於岸左」，⁴⁸ 據此可知沈彥由洪州舟行章江至豐城縣境後，再轉入當時的汝水，溯流而上，至臨川。⁴⁹

二是蕭洲，其地位在袁水匯入贛江處北側不遠，是作為泊船處的江畔沙洲。袁水亦有行旅舟行往來，據《通典·州郡典》的記載，宜春郡「東至章郡水路七百四十里」，⁵⁰ 亦即由袁州可舟行袁水、贛水直抵洪州。當時在新喻縣設有「五浪館」，位在縣西「五浪灘」側，⁵¹ 今已在江口水庫中。但袁水水路並不好走，五浪灘「灘長二里，其地險峻」，而袁水流經其上游昌山時，「巨石枕岸潺激，舟人上下多傾覆」，⁵² 可見舟楫經常在袁水上遭遇危險。李德裕於大和、開成之際，曾舟行水路往來袁州貶所。其在〈畏途賦并序〉載云：「乙卯歲（大和九年，835）孟夏，余俟罪南服，自歷陽登舟，五月屆於蠡澤」，是時「當隆暑赫曦之候，涉潯陽不測之川」，「親愛聞之，無不揮淚」。因此當他於隔年「幸得生去炎方」時，「或有勉余改轍而陸者」，但他還是決定舟行北返。⁵³ 據此可知他至袁州的去程與回程皆是走水路。同年四月，李德裕北返，「屆途豐城，弭楫江渚」，⁵⁴ 尋訪劍池，可以推測他是由袁州舟行袁水入贛江。而孟簡約韓愈在蕭

⁴⁶ 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496。

⁴⁷ 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22，注37。

⁴⁸ 朱長文纂輯，何立民點校，《墨池編》（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卷13，〈贊述三·碎碑說〉，頁384。按：《全唐文》作〈碎碑記〉。

⁴⁹ 按：劍池在今豐城縣西南榮塘鎮，就位置和地形條件劍池不可能與當時的汝水（又名撫州江、撫州河，即今撫河）相接，此處「劍池」應是豐城縣的代名詞，而非實指劍池。

⁵⁰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182，〈州郡典十二·古揚州下〉，頁4843。

⁵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9，〈江南西道七·袁州〉，頁2203。

⁵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9，〈江南西道七·袁州〉，頁2196。

⁵³ 李德裕，《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賦下·北歸六首·畏途賦并序〉，頁435-436。

⁵⁴ 李德裕，《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賦下·北歸六首·劍池賦并序〉，頁440。

洲相會，恐怕與該地是舟船自袁水入贛江後第一個泊船處有關。天祐二年（905），韓偓離開袁州後，九月時曾於「蕭灘鎮駐泊兩月」，到了隔年二月，他已在撫州，三月舟行「自撫州往南城縣」，再進入閩地。⁵⁵ 因此，舟船應是他一路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由袁州舟行袁水入贛江後，於蕭灘鎮停泊，再順流而下至豐城轉汝水，溯流而上至南城縣。

楊吳、南唐統治時期，蕭灘鎮的重要性日益突顯，最後升格為清江縣。這與唐末五代戰亂所形成的割據局勢有關。袁水河谷作為江西往來湖南的主要通道，其軍事用途大增，成為楊吳、南唐與馬楚軍事對抗的前線基地。⁵⁶ 於是位處贛江水路進出袁水河谷門戶的蕭灘鎮就成為重要的轉運與中繼站，匯聚贛江水路、袁水流域與周邊地區的人員與物資。進而南唐政權在昇元二年（938），「以其地當要衝」——「當南粵、虔、吉、袁、洪四會之衝」，為「舟車輻湊」之地，又有「庾廩兵戈之積」，升格為清江縣。⁵⁷ 到了宋初，更在此設置臨江軍。

此外，鄱江上游昌水亦可通楫，由饒州城汭流而上可至黟縣的魚亭山，據《寰宇記》的記載：「每歲西江魚船至祁門縣，捨舟登陸，止此東水次，淹留待船」，⁵⁸ 鄱陽湖的魚產循此水路運往歙州。這條水路也是祁門茶葉外運的交通路線之一，據載元和之前，若遇到茶葉「多市」，大批茶葉「將泛大川」，「必先以輕舟寡載，就其巨艍」。⁵⁹ 只能以小船載送的原因在於祁門河段有「閘門之險」，位在祁門「西南一十里」的閘門灘，「奔流激注，巨石砢礪，騰沸汹涌，灑潏圓折，凡六七里」，其間「溪險石壁，跳波激射，摧艦碎舳」，並不利於行舟，「商旅經此，十敗七八」。⁶⁰ 因此，元和年間（806-821）與咸通三年

⁵⁵ 韓偓著，齊澍箋注，《韓偓詩集箋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卷1，頁48-52。

⁵⁶ 從天祐三年（906）楊吳入據洪州，彭玕請降馬楚開始，袁水河谷就成為楊吳、南唐與馬楚之間戰事的主要發生地：天祐三年至開平四年（910），馬楚援助彭玕勢力對抗楊吳；乾化四年（914）袁州刺史劉景崇叛吳附楚；貞明五年（919）劉信率軍自瀏陽趣潭州聲援荊南；廣順元年（951）邊鎬將兵自袁州入楚。

⁵⁷ 清江縣設置後，先屬洪州，保大十年（952）筠州設置後，割隸筠州。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6，〈江南西道四·筠州·清江縣〉，頁2121；王象之，《輿地紀勝》卷34，〈江南西路·臨江軍〉，頁1472-1473。

⁵⁸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4，〈江南西道二·歙州〉，頁2066。

⁵⁹ 李昉等，《文苑英華》卷813，〈記十七·河渠·祁門縣新脩閘門溪記〉，頁4296-4297。

⁶⁰ 李昉等，《文苑英華》卷813，〈記十七·河渠·祁門縣新脩閘門溪記〉，頁4296-4297；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4，〈江南西道二·歙州〉，頁2068-2069。

吳修安

(862)，縣令路旻與陳甘節兩度加以整治，前者「開斗門以平其隘」，斗門後廢，後者「穴石積木為橫梁，因山派渠」，於是「舟行乃安」，此後「自春徂秋」，冬季枯水期以外的時節，「賈客巨艘，居民葉舟，往復無阻」，⁶¹ 改善了閭門灘的航行條件。

小結

宏觀而言，唐中後期，隨著彭蠡湖向南擴張而形成的新水路：東西向的贛江趙圍汭道（今贛江南支）—擔石湖—信江鄔子港水路與南北向的贛江吳城山汭道水路，都被納入以大運河—長江—贛江為主構成的全國南北水路交通線。是主要水路交通線（大運河—長江—彭蠡湖、擔石湖—贛江下游主泓道〔今贛江北、中支〕—贛江中上游）的輔助路線，在揚州與洪州之間形成三條水路交通線，反映南北水路交通的進一步發展。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據改變了這一形勢，江南運河、錢塘江與信江分屬吳越與楊吳、南唐政權，使得趙圍汭道—擔石湖—鄔子港水路暫時喪失跨地域交通的優勢。而長江（揚州至江州段）與贛江多數時間皆在楊吳、南唐政權的控制之下，贛江主泓道與吳城山汭道仍舊發揮連結政治中心——金陵——的交通優勢。為維持楊吳、南唐政權在江西地區的統治與對外擴張，贛江水路承擔較以往更重的交通運輸功能，蕭灘鎮為「舟車輻湊」之地，有「庾廩兵戈之積」正是這一狀況的體現。

⁶¹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41，〈地理志五·江南道·西道採訪使·歙州新安郡〉，頁 1067；李昉等，《文苑英華》卷 813，〈記十七·河渠·祈門縣新脩閭門溪記〉，頁 4296-4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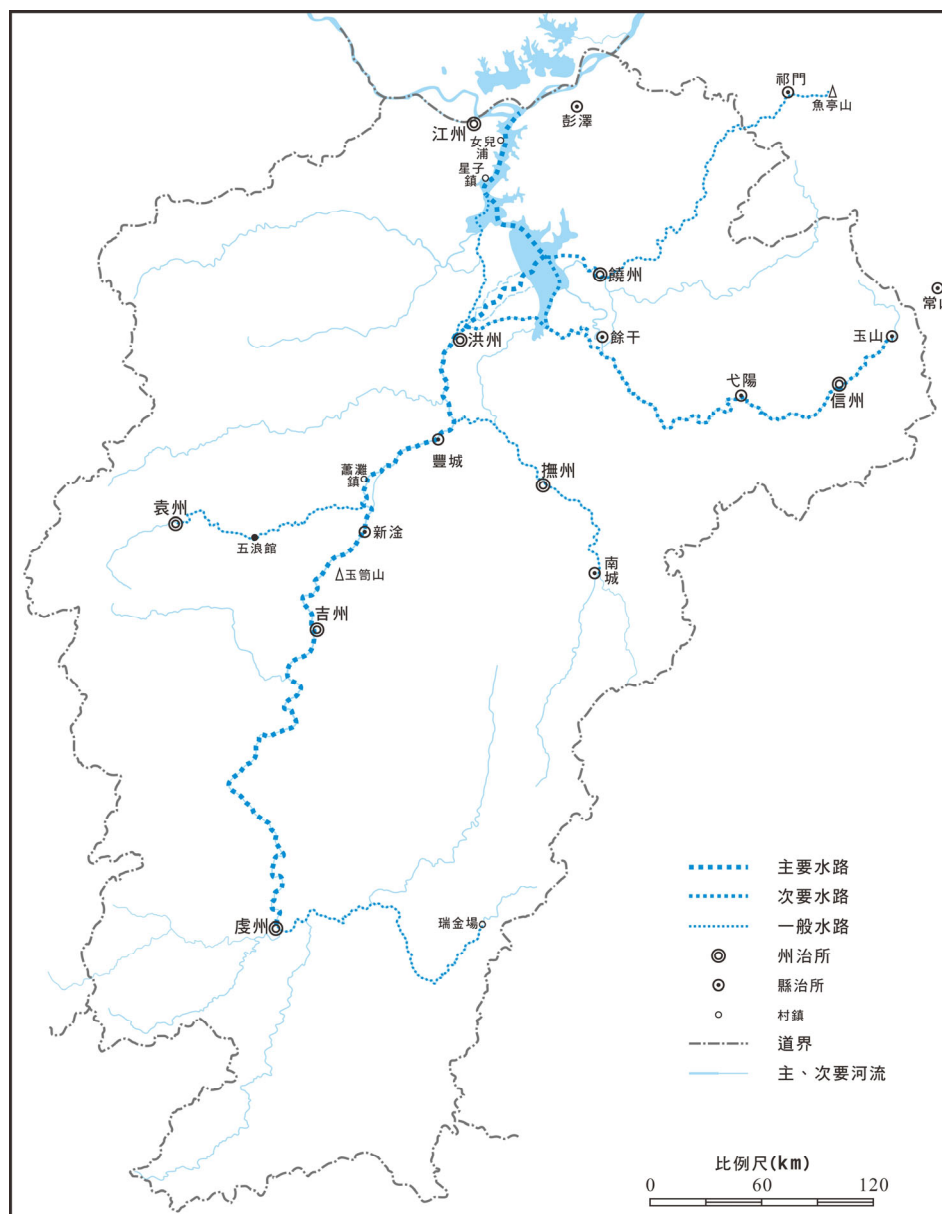


圖 2：唐代江西地區水路交通示意圖

（本圖為筆者繪製，行政建置斷代以元和年間為準，以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5 冊，「唐・江南西道」圖幅為底圖）

參・宋代鄱陽湖水路交通——三角形水路網

到了宋代，隨著鄱陽湖的持續擴張，河湖交錯的水文環境也有所變化。在湖泊泛漲時，水位逐漸上升，湖域隨之擴大，諸河流入湖汊道的水位也相應有所提升，以之作為航路的行旅愈來愈多。南宋時期，這樣的趨勢愈來愈明顯，再加上宋廷以臨安為臨時首都（行在所）所形成的新交通形勢，⁶² 有利於鄱陽湖流域的東西向交通發展。因此，以南康軍（治星子縣）、隆興府與餘干縣為頂點的三角形水路網交通往來更加繁盛。

一・三角形水路之一：南康軍與洪州（隆興府）間

兩宋時期，南康軍與洪州（隆興元年〔1163〕升為隆興府）之間的舟船多走贛江吳城山汊道。大中祥符三年（1010）夏季，內侍趙敦信（趙履信）自廣州奉使返京時，就是走贛江吳城山汊道。因其所奏，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封吳城山龍神為「順濟侯」，並立廟山側，從此吳城山龍王信仰開始興盛。⁶³ 慶曆七年（1047），曾易占奉執政之召前往開封，曾鞏隨侍，六月二十日「行次至洪州樵舍僧寺」，曾易占「既而行次睢陽而卒」，曾鞏「載柩還鄉」，於十二月「復過樵舍」。⁶⁴ 可見曾易占與曾鞏是循贛江吳城山汊道—彭蠡湖—長江—汴河北上，而曾鞏亦循同一水路南返。

龍王信仰也反映在蘇軾的經歷之中，紹聖、元符年間（1094-1100），蘇軾因黨爭被貶謫嶺南，直到哲宗去世後，蘇軾才被逐步內遷而北返。他在南遷與北返時，皆曾舟行贛江吳城山汊道。在〈順濟王廟新獲石碣記〉中，蘇軾明確提及他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四月，「自儋耳北歸」時，曾「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

⁶² 曹家齊指出唐至北宋初，南方南北交通幹線主要通過水路（指長江）來連接。然就筆者所見史料，整個北宋時期，中原與南方各地的水路交通仍是以長江為主要幹道，直到南宋遷都臨安後，才有明顯的改變。張錦鵬則認為宋室南遷後，全國交通中心由開封轉移到杭州，以南北交通為主幹的交通網絡轉向以東西交通為幹線，偏重於聯繫東西部和東南部。曹家齊，《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頁 71-72, 77；張錦鵬，《南宋交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3, 85；吳修安，〈唐宋時期南北交通幹道新探——江西區域視角的考察〉，《國學研究》45（2021）：82-83。

⁶³ 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 52-53。

⁶⁴ 吳曾撰，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能改齋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18，〈神仙鬼怪〉，頁 508-509。

下」，並「進謁」龍王，⁶⁵ 顯示他對龍王信仰風俗的遵循。而蘇軾於紹聖元年（1094）八月循贛江吳城山汊道南下的過程則出現在釋惠洪（1071-1128）的〈跋順濟王記〉，文中記載了順濟王顯靈，助蘇軾於半天內（午夜至正午）由分風浦舟行渡揚瀾湖至豫章城下。⁶⁶ 按：分風浦應即前引《寰宇記》所載的神林灣，又稱為神林浦，為宮亭廟所在，其神祇「能分風上下」，「商旅多於此阻風波，禱廟祈福而獲前進」。⁶⁷ 又據周必大在落星寺「東南觀巨浸」的描述：「右為揚瀾，左為左里，其中兩山如門，是為鄱陽湖」，⁶⁸ 揚瀾湖當是嬰子口西岸一帶水域，左里湖則是嬰子口東岸一帶的水域，經揚瀾湖至洪州應是走嬰子口西南水域，經贛江吳城山汊道。而南康軍走贛江吳城山汊道至洪州的里距超過三百里，⁶⁹ 蘇軾不可能於半天內就溯流而上至洪州城下，釋惠洪所載恐怕是將蘇軾的經歷神怪化了。但蘇軾從南康軍，經揚瀾湖、贛江吳城山汊道至洪州城過程應是事實。⁷⁰ 而揚瀾湖在當時正是「津濟艱險」處之一，⁷¹ 吳城山龍王信仰的出現當與吳城山位在渡湖必經之地有關。

到了南宋，洪邁在《夷堅志》亦記載了一則吳城山順濟龍王顯靈的事蹟：「池州每歲發兵三千人，遣一將督戍江西，率以夏五月會于豫章，番休而歸。紹

⁶⁵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2，〈記·順濟王廟新獲石碣記〉，頁 401。

⁶⁶ 釋惠洪著，釋廓門貫微注，張伯偉等點校，《注石門文字禪》（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27，〈跋·跋順濟王記〉，頁 1584。

⁶⁷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6，〈江南西道四·洪州·南昌縣〉，宮亭湖條，頁 2103；卷 111，〈江南西道九·江州·德化縣〉，彭蠡湖西灣條，頁 2255-2256。

⁶⁸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48-50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澹生堂鈔本影印），卷 169，〈泛舟游山錄三〉，第 50 冊，頁 476。

⁶⁹ 據《太平寰宇記》的記載，南康軍「南至洪州二百七十七里，水路四百五十里」，水路里距超過陸路里距太多，不可能是走贛江吳城山汊道，而應是走漢晉以來的贛江主流。又南康軍軍境為「南北二百四十里」，其「西至江州一百五十里。……北至江州湖口縣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江州湖口縣水路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廬山康王觀太源界七十里」，則南康軍至南境之外的吳城山里距當超過一百二十里，而據《輿地紀勝》的記載，吳城山在隆興府（洪州）「北一百八十里」，是則南康軍走贛江吳城山汊道至洪州的里距當超過三百里，至多到三百五十里。參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11，〈江南西道九·南康軍〉，頁 2261；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26，〈江南西路·隆興府〉，景物門下，頁 1162。

⁷⁰ 按：蘇軾有〈望湖亭〉詩，據考察此亭位在吳城山，此詩作於紹聖元年八月。參見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164。

⁷¹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方域 13，〈津渡〉，頁 9535。

興二十五年（1155），統制官趙玘受代去，行兩日，泊舟順濟祠下。」因祭神結束後，趙玘「攜妓入廟飲酒」，觸怒廟神，「行未至湖口縣三十里」，遭遇「大赤斑龍」的襲擊，「他舟覆者數十艘，沉士卒數十人，巨商同宗行者，亦多溺死」。⁷² 由此可知紹興年間（1131-1162），池州（指池州駐劄御前諸軍、池州都統司）派遣支援江西的軍隊，於每年夏天番休時，自洪州城舟行贛江吳城山汊道北返池州，並在吳城山龍王祠祭拜龍神後，才渡湖北上。

乾道元年（1165）七月，陸游「自京口移官豫章，冒風濤自星子解舟，不半日至吳城山小龍廟」，其詩云：「清晨放船落星石，大風吹颿如箭激，……却上吳城觀落日。」⁷³ 可見夏秋之際湖水泛漲時，由南康軍至吳城山，在借助風勢的情況下，也需要半天的時間。

周必大亦曾多次舟行贛江吳城山汊道：乾道三年（1167）三月，周必大因岳父王葆病重，由廬陵舟行北上趕往宜興探視；六月中旬，王葆病逝，在協助料理後事後，於八月下旬由宜興舟行返回廬陵。⁷⁴ 乾道六年（1170）四月，周必大又因新職缺需向皇帝「奏事」，由廬陵舟行前往臨安。周必大這幾次往返行旅皆經由贛江吳城山汊道，並在〈泛舟游山錄〉與〈奏事錄〉留下詳細記載：

（乾道三年三月）乙巳，……申時過隆興府，……晚泊鰕魚潭夾中。丙午，……候至巳時方行。晚泊吳城山廟下，登望湖亭，春水未生，涯渚歷歷。……丁未，舟人賽廟畢解去。自此入湖，掠珠溪、神岡、左里廟，皆不泊。湖中多沙山，望之如雲，……未後次南康軍，……⁷⁵

⁷²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乙志卷10，〈湖口龍〉，頁266。按：池州每歲發兵，遣一將督戍江西之事，其他文獻記載略有不同，《宋會要輯稿》：「紹興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令池州駐劄御前都統制岳超差撥一千人赴江西帥司，分布駐劄，仍每歲一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亦有同樣的記載，而文字略有出入：「（紹興二十八年正月）癸未，……詔池州都統司遣御前軍千人赴江西帥臣分布駐劄，歲一替，用本路安撫使折彥質請也。」在實施的時間與派遣人數並不相同，而洪邁云此則故事出自其在紹興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間擔任江西安撫使、知洪州的岳父張宗元。徐松，《宋會要輯稿》兵5，〈屯戍上〉，頁8709；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179，頁3423。

⁷³ 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2，〈夜聞松聲有感〉，頁122。錢仲聯校注云：「丙戌為乙酉之誤。」

⁷⁴ 鄒錦良，《周必大生平與思想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98-102。周必大的〈泛舟游山錄〉詳細記載往返旅程。見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7-169，〈泛舟游山錄〉，頁435-483。

⁷⁵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7，〈泛舟游山錄一〉，頁435。

（十月）癸亥，早發南康，……過左里、揚瀾，泊珠溪，……去軍已八十里，有巡檢司及小市，……甲子，南風，晡時方行十里，至吳城山。謁廟畢，登望湖亭，……十一月乙丑朔，風順，行百三十里，夜宿連前渡，雨。丙寅，……未後抵豫章，泊南浦亭，亭在洪喬門。⁷⁶

（乾道六年四月）庚戌，諸公來別，……即解維。過樵舍鎮，……宿昌邑山。五月辛亥朔，……午後抵吳城山，謁廟，……壬子，早陰霾，風逆。行二十餘里而晴，風色亦順，揚帆頗駛。未後抵南康軍，……⁷⁷

不管是經贛江吳城山汊道渡湖北上，還是渡湖後經贛江吳城山汊道南下，周必大都會在吳城山停留，並祭拜龍王廟——「賽廟」或「謁廟」，前者比後者更加盛大以示虔誠。⁷⁸ 因此，可以推斷循贛江吳城山汊道交通往來的舟船大多會在吳城山順濟龍王祠祭拜龍王，以祈求航行安全。

從周必大的記載可知，在白天行舟，晚上泊船的情況下，由隆興府走贛江吳城山汊道順流而下至南康軍，快則需要二天，慢則三天；而由南康軍走贛江吳城山汊道溯流而上至隆興府，則需要四天。在這條航路上先後會經過鰲魚潭（今地不詳）、⁷⁹ 連前渡（約在樵舍鎮南十里）、⁸⁰ 樵舍鎮、昌邑山、吳城山、珠溪（今廬山市蓼南鄉渚溪村）、神岡、揚瀾湖與左里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之前舟行贛江吳城山汊道多在夏秋鄱陽湖湖水泛漲之時，周必大這二次航行贛江吳城山汊道時是在湖水尚未泛漲及已消退後。三月雖是春末，但是時「春水未生」，而十月、十一月之際則已經「水落」，這表明南宋贛江吳城山汊道在枯水期亦可通航，已正式取代贛江主泓道的航運功能。

⁷⁶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9，〈泛舟游山錄三〉，頁 476。

⁷⁷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70，〈奏事錄〉，頁 485。

⁷⁸ 按《夷堅志》記載了一則陳晦舟行經吳城山龍王廟，謁禮不敬，終在大孤山遭遇「巨龍」的故事，其中載云船人曾請陳晦「以豬賽廟」，可以推測「賽廟」是比「謁廟」還要盛大虔誠的祭拜活動。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 15，〈大孤山龍〉，頁 314。

⁷⁹ 按周必大一行於申時（下午 3 時至 5 時）經過隆興府，已接近傍晚，酉時（下午 5 時至 7 時）天色轉黑，因此鰲魚潭夾應該離隆興府不遠。

⁸⁰ 按連前渡距吳城山一百三十里，而據《輿地紀勝》，吳城山在隆興府北一百八十里，明代所編的《寰宇通衢》則記載：「吳城驛，一百二十里至樵舍驛，六十里至本司南昌府南浦驛。」連前渡當在樵舍之南十里。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26，〈江南西路·隆興府〉，景物門下，頁 1162；官撰，楊正泰點校，《寰宇通衢》（收入《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45。

二・三角形水路之二：洪州（隆興府）與餘干縣間

洪州與餘干縣之間則多走贛江南支—鄱陽湖—信江鄒子港汊道水路。嘉祐六年（1061）初冬，趙抃（1008-1084）由衢州赴任「知虔州」，即舟行循信江而下，過鄱陽湖至洪州，其詩云：「危檣西喜洪都近」，⁸¹ 應是走贛江趙圍（趙家莊）汊道西行。紹興年間，徐俯（1075-1141）有〈鄒子值風雨〉詩云：「重湖浪四起，支川舟不行」，⁸² 顯示他曾在鄒子等待渡湖。按徐俯為分寧人，紹興九年至十一年間（1139-1141）主要在饒信一帶活動（曾知信州，最後死於饒州），⁸³ 此詩應是作於往返信州與洪州途中。

乾道八年（1172）二月，周必大坐事罷歸廬陵，亦循此水路回鄉。他先連同家人由臨安北上，水陸兼程，繞道浙西、江東經池州至饒州，接著溯樂安江、餘干水汊道至餘干江口，再沿鄒子港汊道順流而下，經樹紅（有洪福院，當在鄒子寨上游不遠處）⁸⁴ 至鄒子寨。渡鄱陽湖後，本欲舟行贛江循趙家莊的汊道溯流而上，因時值五月，鄱陽湖「巨浸稽天」，汊道「湍急不可泝」。只好循汊道旁的陂湖，經石礫湖（今南昌縣鯉魚洲東）、⁸⁵ 趙氏池（今南昌縣昌東鎮趙圍附近）與高磯湖（今南昌縣昌東鎮吉南村南境）⁸⁶ 後才進入汊道至徐汊（今昌東鎮滁槎

⁸¹ 趙抃有〈得守虔州過鄉邦贈別衢州太守高賦同年〉、〈守虔過家登高齋即事〉、〈同信守趙誠司封會靈山亭〉、〈登龜峰群峰亭〉、〈過鄱陽湖先寄洪守唐介待制〉、〈將至太和寄蔡仲樞太傅〉、〈入贛聞曉角有作〉等詩與〈知虔州到任謝上表〉，其〈過鄱陽湖先寄洪守唐介待制〉詩云：「上蒙家留榮且哀，贛民應怪苦徘徊。鄱陽湖共天同闊，不惜乘風破浪來。……危檣西喜洪都近，諫省當時舊主人。」可知其渡鄱陽湖是為了前往贛州。參見趙抃，《趙清獻公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6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汪旦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影印），卷1，頁696-697；卷2，頁715；卷5，頁740；卷10〈知虔州到任謝上表〉，頁810-811。

⁸²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26，〈江南西路・隆興府〉，景物門下，頁1167。

⁸³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30，紹興九年七月丙午條，頁2446；卷141，紹興十一年七月，頁2665。

⁸⁴ 同治《餘干縣志》載云：「洪福寺，在瑞洪，楊吳武義中建。」區作霖纂修，同治《餘干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卷4，〈建置志二・寺觀〉，頁261。

⁸⁵ 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江西省五萬分一地形圖》（臺北：內政部圖書館藏）「滁槎」圖幅，1927年1月。按：明清方志等文獻皆不見有石礫湖的相關記載，唯此圖在鯉魚洲東側繪有「石礫池」水域，應即石礫湖殘餘。

⁸⁶ 按：高磯湖位在趙氏池與徐汊之間，明清時期高溪圩就位在趙家圍（趙圍）與滁槎之間，疑即高磯湖所在。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江西省五萬分一地形圖》「滁槎」圖幅，1927年1月。

村），接著換乘小艇順風泝流至隆興府。⁸⁷ 又周必大在渡鄱陽湖遇「巨浸稽天」後云：「非丙戌歲經從之比」，丙戌歲即乾道二年（1166）。是年大部分時間，周必大都在家鄉廬陵，僅十月專程前往上饒，將母親的靈柩遷回廬陵安葬。⁸⁸ 因此，周必大此行是以舟船運送靈柩，走水路循信江鄔子港汊道—鄱陽湖—贛江趙圍汊道返回廬陵。據其所撰〈先夫人王氏墓志〉的記載，他此行是「十月如上饒。十一月庚戌啟土，翌日護柩以行，十二月壬申達於吉」，⁸⁹ 即十一月十日自上饒出發，十二月三日抵達吉州，前後歷時 23 天。⁹⁰ 此時正值冬季，湖水早已消退，當然不會是「巨浸稽天」的景象。

楊萬里在淳熙年間（1174-1189）曾數度循此水路往來兩浙與家鄉吉州吉水縣。淳熙四年（1177）四月，楊萬里從吉水出發，舟行「之官毗陵」，赴任「知常州事」，在經過這條水路時留下了〈舟次西徑〉與〈餘干泝流至安仁〉二詩。前詩云：「夜來徐汊伴鷗眠，西徑晨炊小泊船。蘆荻漸多人漸少，鄱陽湖尾水如天」，⁹¹ 可知他走的是贛江趙圍汊道入湖，途中曾夜宿於徐汊以及晨炊於西徑（今地不詳），後者已是鄱陽湖尾的水域範圍。後詩則反映楊萬里在渡湖後，是舟行信江鄔子港汊道至餘干，再走信江水路泝流而上，經玉山、常山道北上常州。淳熙六年（1179），楊萬里移官「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三月由常州出發先行返家，四月四日走陸路經衢州江山縣進入江東路信州永豐縣境，四月十三日渡鄱陽湖，先後留下〈四月十三日渡鄱陽湖〉、〈已至湖尾，望見西山〉與〈豫章光華館苦雨〉等詩作。⁹² 其中〈已至湖尾，望見西山〉云：「已入江西

⁸⁷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71，〈南歸錄〉，頁 494-506。

⁸⁸ 李仁生、丁功誼，《周必大年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頁 96-100。

⁸⁹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36，〈省齋文稿三十六·墓誌銘六·先夫人王氏墓志〉，頁 63。

⁹⁰ 即陽曆十二月四日出發，同月二十六日抵達，據中央研究院「兩千年中西曆轉換」系統。

⁹¹ 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8，〈詩·荊溪集〉，頁 442-443。辛更儒箋證云：「徐汊當在贛江入湖口，即隆興府東北。而西徑，則自應在徐汊以東，疑即餘干西之西律。」按：從詩的內容可知楊萬里舟泊夜宿於徐汊，泊船晨炊於西徑，亦即他在天剛破曉即出發，從出發到晨炊的時間並不會太長，因此西徑離徐汊應該不會太遠。從其他詩文中亦可發現，楊萬里在行旅途中，經常會在天亮後先趕一段路程，再休息晨炊，所走路程里距大約不超過二十里。而從徐汊到西徑的景觀是「蘆荻漸多人漸少」，反映此段路程尚在進入鄱陽湖的階段，所以西徑不應該是在鄱陽湖以東的餘干縣境。

⁹²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13-14，〈詩·西歸集〉，頁 645-735。辛更儒於卷 14 卷首按語云：「本卷所載，為淳熙六年夏至年底，自南康歸，居家吉水作。」然這二卷所載詩

猶未覺，忽然對面是西山」，可見他渡湖是以隆興府為目的地；〈豫章光華館苦雨〉是他抵達隆興府後，時值梅雨季節所作。從其旅程推測，他應在信江某處乘舟順流而下，渡鄱陽湖，後溯贛江至隆興府。值得注意的是〈四月十三日渡鄱陽湖〉詩云：「近歲六暄涼，此水三往返」，明確指出他在淳熙元年至六年間（1174-1179），曾三度循此水路交通往來。除前述二次行旅之外，還有一次應該是在淳熙元年，前一年年末（乾道九年，1174），他以母親年邁為由請求外任，「知漳州」，於隔年夏天離開臨安回到吉水「待次」，⁹³但並未留下任何有關在鄱陽湖行旅的詩文。可以推測其行旅路線亦是舟行信江鄒子港汊道—鄱陽湖—贛江趙圍汊道水路。

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楊萬里「得請補外」，出知筠州，他趁機先行返回吉水老家。由臨安走水路循錢塘江、信江南下，在端午節前後橫渡鄱陽湖，留下了〈五月一日過貴溪舟中苦熱〉、〈端午前一日阻風鄱陽湖觀競渡〉、〈初六日過鄱陽湖入相見灣〉與〈過趙家莊〉等詩。其中〈過趙家莊〉詩云：「老子方孤悶，西山忽在旁。回頭鄒子砦，明眼趙家莊。試飲章江味，中涵吉水香」，⁹⁴可知楊萬里是走鄒子港汊道，由鄒子寨入鄱陽湖，渡湖後入相見灣，再接章江（即贛江）經趙圍汊道至南昌。他在描述相見灣時云：「一灣九步十縈迴」，反映相見灣是處在鄱陽湖的邊緣地帶，湖床地貌仍隱然可見，並影響舟船的航行，因此相見灣應是位處章江趙圍汊道下游入湖處。⁹⁵

嘉泰年間（1201-1204），永嘉四靈（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亦先後舟行此水路前往江西與湖南。嘉泰元年，趙師秀（1170-1220）入江西安撫司幕職，翁卷一路同行，留若干唱和詩作。⁹⁶前者有〈簡同行翁靈舒〉與〈信州草衣寺〉，後者有〈信州草衣寺〉、〈宿鄒子寨下〉與〈同趙靈芝、杜子野游豫章總

作並未涉及南康軍，不知其所據為何？蕭東海在《楊萬里年譜》中亦未載明楊萬里在淳熙六年曾到南康軍。蕭東海，《楊萬里年譜》（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頁153-156。

⁹³ 蕭東海，《楊萬里年譜》，頁121-124。

⁹⁴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24，〈詩·江西道院集〉，頁1259-1262。

⁹⁵ 辛更儒箋證云：「相見灣，當在餘干縣西北信江入鄱陽湖口處，……其地今已無考。」但從詩名「過鄱陽湖，入相見灣」推測，相見灣不當在信江入湖處，而應在贛江入湖處附近。關於鄱陽湖的景觀地貌特徵，參見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49-51。

⁹⁶ 關於趙師秀、翁卷江西行的時間，參見吳晶的考證。吳晶，《永嘉四靈：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頁237, 278。

持寺》。⁹⁷ 其中，〈宿鄔子寨下〉一詩有學者認為是作於嘉定五年（1212），⁹⁸ 然詩云：「已謁龍君廟，明朝早過湖。傍沙船盡泊，經火地多枯。秋至昏星易，空長楚月孤」，可知翁卷在鄔子寨等待渡鄱陽湖的時節為秋天。而〈簡同行翁靈舒〉云：「水禽多雪色，野笛忽秋聲」，〈同趙靈芝、杜子野游豫章總持寺〉亦云：「滿寺是秋風，吹開黃菊叢。」據此，〈宿鄔子寨下〉一詩應是翁卷與趙師秀同行所作，二人舟行信江循鄔子港汊道至鄔子寨，隔日才渡湖前往隆興府。嘉泰二年，徐璣（1162-1214）赴任永州司理參軍，徐照（？-1211）也與之同行，⁹⁹ 二人由溫州出發，亦途經此水路。徐照於途中留下〈信州水南〉、〈題信州祥符寺〉、〈題信州趙昌甫林居〉、〈過鄱陽湖〉與〈洪州城下作〉等詩，¹⁰⁰ 可知二徐在途經信州後，即渡鄱陽湖至隆興府，其所走水路只能是信江鄔子港汊道—鄱陽湖—贛江南支。

綜上所述，從洪州（隆興府）至餘干縣，這條航路上先後會經徐汊、西徑、趙家莊、相見灣、鄱陽湖、鄔子寨、樹紅，其中徐汊至鄱陽湖之間還有一條經石礮湖、趙氏池與高磯湖等陂湖的水路。

三·三角形水路之三：餘干縣與南康軍間

餘干縣與南康軍之間最直接的水路是走信江鄔子港汊道—鄱陽湖。紹熙三年（1192）閏二月，時任江東轉運副使的楊萬里奉詔在信州「決讞死囚」，由建康府起程行部，於三月陸行抵達上饒，後自上饒「解舟」，乘船沿信江順流而下，

⁹⁷ 趙師秀撰，趙平校點，《清苑齋詩集》（收入《永嘉四靈詩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卷1，頁207；翁卷撰，趙平校點，《葦碧軒集》（收入《永嘉四靈詩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卷1，頁156-157。

⁹⁸ 翁卷著，余力箋注，《翁卷集箋注》（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78-79。余力云：「從所描繪的情景看，詩當作於嘉定五年『峒亂』剛剛平息之後。」其所指「峒亂」應為嘉定元年爆發的郴州黑風峒亂，三年宋廷以王居安知隆興府「督捕峒寇」後，「溪峒略平」。且據李榮村的研究此峒亂波及江西的吉、贛與南安，無涉饒、信。因此余力所言恐怕並不正確。參見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39，〈寧宗本紀三〉，嘉定三年二月壬午條，頁754；卷405，〈王居安傳〉，頁12253-12254；卷494，〈蠻夷傳二·西南溪峒諸蠻下〉，頁14195。李榮村，〈黑風峒變亂始末—南宋中葉湘粵贛間峒民的變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3（1969）：501, 508-512。

⁹⁹ 關於徐璣與徐照永州行時間，見吳晶，《永嘉四靈》，頁74-75。

¹⁰⁰ 徐照撰，趙平校點，《芳蘭軒集》（收入《永嘉四靈詩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卷1，頁27-29。

經鄱陽湖—長江水路返回建康府。¹⁰¹ 途中先後留下〈舟過安仁〉、〈過鄱陽湖天晴風順〉、〈舟至湖心，望豫章西山雲起，風雨驟至〉、〈悶歌行〉、〈明發康郎山下，亭午過湖，入港，小泊棠陰砦，回望豫章兩山，慨然感興〉、〈宿四望山下望廬山〉、〈明發四望山，過都昌縣，入彭蠡湖〉與〈宿廬山栖賢寺，示如清長老〉等詩。¹⁰² 其中，〈悶歌行〉詩云：「問來鄒子到南康，水路都來兩日強」，〈明發康郎山下〉亦云：「前日至鄒子，西山出湖湄」，可見楊萬里此行是由信江鄒子港汊道入湖。入湖後，其詩又載云：「廬陵歸路從西去，却峭東帆趁落潮」（〈過鄱陽湖天晴風順〉），亦即由鄒子入湖後，可分為二路：往西是他平時回到吉州的常行水路，也就是上述贛江趙圍汊道—鄱陽湖；但他此行卻往北，循鄱陽湖—長江水路東下江寧府。從上述詩作內容可知，從鄒子寨到南康軍途中會經過康郎山、几子山（今磯山）、棠陰寨、四望山、都昌縣與彭蠡湖等地。一般而言，兩天以內就會抵達南康軍，但楊萬里一行舟行至湖心康郎山附近時，卻因「阻風」，不得不泊舟三天，前後費時五天才抵達南康軍。¹⁰³ 關於舟行這條水路的記載並不多，目前僅確定楊萬里曾循此水路東下。然而他在阻風康郎山時曾賦詩云：「南人方理北歸舟」（〈悶歌行〉），於四望山出發時，亦有詩云：「眾船爭取疾，直赴兩山口」（〈明發四望山〉），可見航行在這條水路上的舟船並不少。大約與楊萬里同一時期的許及之（?-1209），文集中有〈阻風泊塘陰寨，登四望山用前韻〉與〈端午日過左蠡〉二詩，¹⁰⁴ 應該也曾舟行此條水路北上。

棠陰寨、四望山以北的水路亦是饒州與南康軍之間舟行往來的航線，如前所述，從唐五代時期就已是如此。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離任「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由饒州北上開封，曾於棠陰泊船，留下〈解使事泊棠陰時三弟皆在京師〉的詩作。¹⁰⁵ 建炎元年十一月（1127），李綱被「令鄂州居住」，隔年春夏之際，經歙州黟縣至鄱陽，後「自鄱陽泛江至星子」，其所泛之江就是湖水消退

¹⁰¹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34-35，〈詩·江東集〉，頁1723-1829；蕭東海，《楊萬里年譜》，頁262。

¹⁰²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35，〈詩·江東集〉，頁1797-1805。

¹⁰³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35，〈詩·江東集〉，頁1799。

¹⁰⁴ 許及之，《涉齋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61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影印），卷6，頁37-38。

¹⁰⁵ 王安石撰，聶安福、侯體健、趙惠俊整理，《臨川先生文集》（收入《王安石全集》第5-7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卷6，頁218-219。

後，呈現河湖交錯的鄱陽湖水域，其詩云：「來檣與去櫂，倏忽馳千艘」，¹⁰⁶可見這條水路上有很多舟船航行。而紹興十一年（1141），周輝隨侍其父周邦前往饒州擔任幕職時，就是舟行此水路南下，「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離任時，兩人亦循此水路「自番陽順流東歸，至南康阻風，留一日」。¹⁰⁷南宋中期，臨安士人洪咨夔（1176-1236）亦有〈過四望山〉、〈阻風呈趙使君〉、〈左蠡〉與〈落星寺〉等詩。¹⁰⁸他曾於嘉定元年出任「饒州教授」，這些詩作應該是於離開饒州時所作。亦即由南康軍走水路，經左蠡湖、都昌縣、四望山至棠陰寨後，可繼續南下經康郎山、鄔子寨，入信江汊道至餘干縣，或往東至饒州。

而饒州與餘干縣之間則有樂安江—信江汊道水路。如前所述，餘干水在餘干縣治附近分汊後，一支北流至鄱陽縣境注入鄱江上游的樂安江。周必大在乾道八年五月就曾循此水路，由饒州城泝流至餘干縣，再走鄔子港汊道—鄱陽湖—贛江水路返回廬陵。¹⁰⁹由於「溪曲帆破」，船隻只能以牽挽的方式泝流，每天約僅航行二、三十里，第五天才至餘干江口。¹¹⁰大約同一時期，趙蕃在某年七、八月間，自玉山循信江順流而下至餘干，隨即易舟順流航行此水路，二天後抵達鄱陽。¹¹¹喻良能亦曾多次循此水路往來鄱陽與信州間，其一由鄱陽返回貴溪：「八月二十八日離番陽，十月二日回至貴溪，蓋三十五日，舟行凡三百六十里也。」¹¹²一天僅行十里，並非正常航行速度，恐怕喻良能途中曾在餘干與安仁「應接人

¹⁰⁶ 按：其詩云：「……及茲夏潦漲，……試命具舟楫，……巨浸與天永，東流日滔滔。來檣與去櫂，倏忽馳千艘。進舟枕席間，舟子巧所操。……風帆擘巨浪，大艣駕雲濤。百里須臾間，千里不崇朝。」參見李綱，《梁溪先生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36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道光刊本影印），卷17，頁395。

¹⁰⁷ 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2，〈重湖詩〉，頁60；卷3，〈廬山〉，頁118。

¹⁰⁸ 洪咨夔著，侯體健點校，《洪咨夔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卷1，頁12-13。

¹⁰⁹ 關於信江入湖三角洲水系的分析，參見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56。

¹¹⁰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71，〈南歸錄〉，頁505。

¹¹¹ 趙蕃，《乾道稿》（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2260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卷下，頁11。

¹¹² 喻良能，《香山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56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影印），卷12，頁153。

事」，或遊歷山水。其一由鄱陽返回安仁：「去歲十月六日由番江向安仁。」¹¹³ 由上述例子可知，這條水路是饒州往來信州與贛江流域諸州重要的水路交通線，循此水路至餘干縣接信江水路，可東抵信州，西渡鄱陽湖接贛江水路。

如同吳城山有順濟龍王廟，鄔子寨亦有一座龍王廟，欲渡鄱陽湖者必先「謁廟」，以祈求航行安全。周必大於乾道八年五月到鄔子寨後，「謁廟畢」，才「令寨兵前導入湖」。¹¹⁴ 范成大於乾道九年（1173）閏正月渡鄱陽湖時，前一日「宿鄔子口」，「泊舟龍王廟」，隔日「禱於龍神」後，才「發船鄔子」。¹¹⁵ 嘉泰元年秋天，翁卷同趙師秀渡鄱陽湖時亦曾「宿鄔子寨下」，詩云：「已謁龍君廟，明朝早過湖。」¹¹⁶ 這座龍王廟的神祇可能也是吳城山龍王，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在南宋建炎之前，鄔子寨上游的弋陽縣已存在一座彭蠡順濟龍王別祠，¹¹⁷ 有理由相信它是由鄔子寨沿著信江水路往上游傳播而來的，亦即鄔子寨的龍王廟亦是吳城山龍王信仰的一環。

龍王信仰也出現在吳城山與鄔子寨之外的其他鄱陽湖湖域。嘉祐三年（1058）五月，馮浩赴任「江南西路轉運使」，舟行「過松門口」，「眾傳有小龍王者甚靈，馮不之信」，不久小龍王顯靈，馮浩「乃焚香禱之」。¹¹⁸ 松門口顧名思義就是在松門山，這顯示馮浩是經松門山走當時贛江的主泓道（今贛江北、中支）前往洪州。這是在上述三條水路之外，另一條穿越鄱陽湖的水路。如前所述，唐五代時期，它是鄱陽湖區最主要的水路交通線，但在兩宋時期，其重要性已大為降低，航運功能大多為吳城山汊道所取代。除馮浩之外，目前僅見蘇轍與范成大曾舟行贛江主泓道。元豐七、八年之間（1084-1085），蘇轍由筠州舟行水路前往池州績溪任官，其中在洪州與南康軍之間留下了〈滕王閣〉、〈題都昌清隱禪院〉、〈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與〈題南康太守宅五老亭〉等詩作，可知他是走贛江主泓道，經都昌縣南山，穿越松門口、嬰子口，抵達南康軍。¹¹⁹

¹¹³ 喻良能，《香山集》卷14，頁169。

¹¹⁴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71，〈南歸錄〉，頁505。

¹¹⁵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驂鸞錄》（收入《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48。

¹¹⁶ 翁卷，《葦碧軒集》卷1，頁156。

¹¹⁷ 徐松，《宋會要輯稿》禮21，〈諸神廟〉，頁1087。

¹¹⁸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68，〈神異幽怪一·彭蠡龍君〉，頁904；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28，頁1014。

¹¹⁹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3，頁308-317。〈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詩云：「莫發鄔陽市，曉撈彭蠡口。……」

而范成大在乾道九年閏正月由鄒子渡鄱陽湖至隆興府時，曾「宿范家池湖中」，¹²⁰ 范家池就在今贛江中支北側，因此范成大由鄒子渡鄱陽湖後，是循贛江主泓道舟行至隆興府。兩者皆是在冬季湖水消退之後，不循常行水路（吳城山汊道與趙家莊汊道），而繞道較為迂遠的水路，反映當時的常行水路可能不利於舟船航行。

四・南康軍北上接長江水路

三條水路頻繁的舟船往來顯示宋代鄱陽湖已漸成水運要地，由此三角形水路網的頂點——南康軍、洪州（隆興府）與餘干縣向外延伸出三條水路，進而與全國水陸路交通要道相連結。其中，由南康軍北上至湖口縣的水路皆在鄱陽湖內，大體循唐五代即已形成的水路。就筆者所見資料，宋代舟行在這條水路上，由南而北先後會經過長嶺（今廬山區東南長嶺村）、¹²¹ 女兒浦（又名女兒港）、¹²² 大孤山¹²³ 與黃泥汊（大孤山以東水域）¹²⁴ 等地，過了湖口縣治後就接長江水路。

大孤山是最重要景點，吸引不少文人騷客的目光。一方面是因為它「屹然獨峙」¹²⁵ 湖心所形成的景觀，「如道士冠立碧波萬頃中」，「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被視為是奇觀之一。¹²⁶ 另一方面，大孤山水域為「津濟艱

¹²⁰ 范成大，《驂鸞錄》，頁48。

¹²¹ 周必大於乾道三年八月由宜興返回廬陵，十月壬子，「揚颿掠大孤，午後過長嶺……晡後次南康軍」。據《廬山記》的記載，長嶺為「彭蠡湖之別嶼」。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9，〈泛舟游山錄三〉，頁468；陳舜俞，《廬山記》（南宋紹興間刊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1，〈敘山北篇第二〉，頁11。

¹²² 洪芻有〈泊女兒浦〉詩。周必大於乾道三年三月由廬陵前往宜興，戊申日「晚泊女兒港」。趙蕃有〈過女兒浦〉與〈抵南康〉詩。王象之，《輿地紀勝》卷25，〈江南東路・南康軍〉，總山南詩門，頁1123；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7，〈泛舟游山錄一〉，頁436；趙蕃，《乾道稿》卷上，頁6。

¹²³ 兩宋時期有許多士人舟行途經大孤山時留下記錄，就筆者所見有余靖〈過大孤山〉、黃庶〈大孤山〉、黃庭堅〈泊大孤山作〉、劉弇〈大孤山〉、晁補之〈大孤山祠〉、周必大〈泛舟游山錄〉、〈奏事錄〉、楊萬里〈大孤山〉等。

¹²⁴ 周必大於乾道三年三月己酉，「過大孤，泊黃泥汊」。正德《南康府志》載云：「大孤湖，去（星子）縣北七十里，東接湖口黃泥汊。」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7，〈泛舟游山錄一〉，頁436；正德《南康府志》卷2，〈山川・星子縣〉，頁33。

¹²⁵ 嘉靖《九江府志》卷2，〈方輿志・山川〉，頁82。

¹²⁶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吳船錄》（收入《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下，頁232；陸游撰，李昌憲整理，《入蜀記》（收入《全宋筆記》第5編第8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卷3，頁186。

險」處，「風浪卒起，舟船立至傾覆」，北宋天聖年間（1023-1032）已「逐年沉溺人命不少」。¹²⁷ 南宋時，《夷堅志》記載二則在大孤山水域發生事故的故事：一是江西轉運使陳晦於按部途中，因在吳城山龍王祠「謁禮不敬」，而遭遇「大孤山龍」的襲擊；¹²⁸ 一是宜黃縣民莫寅的船隻為州府所徵用，於大孤山下，「桅檣為風所折」。¹²⁹ 而周必大於乾道六年五月，舟行過大孤山水域時，亦覺「軒簸可畏」。¹³⁰ 可見宋代大孤山附近一直是船隻航行較為危險的水域，因此在其兩側湖岸皆有供行旅短暫休憩的泊船處。西側為女兒浦，洪芻與周必大皆曾在此泊船等待渡湖，據前引《寰宇記》所載，女兒浦在晚唐五代已有女兒廟，「禱祈亦有靈應」，¹³¹ 舟人們致祭所祈求的應是經過大孤山水域時平安無事。東側為黃泥汊附近的樟汊，周必大於乾道三年三月己酉日，由女兒港橫渡大孤山水域時，因「北風作」，先泊船黃泥汊，進而「退泊樟汊港口」，以待風勢停息。¹³²

一般而言，往來南康軍與湖口僅需一天內的時程（曉行夜宿），如周必大於乾道三年十月壬子日與六年五月丁巳日皆在一天內往來。前者由湖口順風逆流而上，「午後過長嶺十餘里，……晡後次南康軍」；¹³³ 後者由南康順風順流而下，「拂旦離南康，……午後次湖口縣」，¹³⁴ 約八小時就由南康軍抵達湖口縣。但在乾道三年三月，周必大卻受北風所阻，花了四天才從南康軍舟行抵達湖口縣。¹³⁵ 可知阻風與否，會大大影響舟船航行的時程。

¹²⁷ 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 13，〈津渡〉，頁 9535。

¹²⁸ 洪邁，《夷堅志》乙志卷 15，〈大孤山龍〉，頁 314。

¹²⁹ 洪邁，《夷堅志》丁志卷 8，〈宜黃人相船〉，頁 602。

¹³⁰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70，〈奏事錄〉，頁 486。

¹³¹ 據嘉靖《九江府志》的記載，女兒廟致祭的對象為大孤山，而女兒港「水漲可容舟百餘」。參見嘉靖《九江府志》卷 2，〈方輿志·山川〉，頁 83, 88。

¹³²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7，〈泛舟游山錄一〉，頁 436。

¹³³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9，〈泛舟游山錄三〉，頁 468。按：「晡」即申時（下午 3 時至 5 時），「晡後」應指傍晚。

¹³⁴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70，〈奏事錄〉，頁 486。

¹³⁵ 〈泛舟游山錄〉載云：「（乾道丁亥三月）戊申，……日已過未，遂解去。……晚泊女兒港。」「己酉，早昏霧，辰後方解，而北風作。過大孤，泊黃泥汊。登岸，沿港入飯籬山民居。風不止，退泊樟汊港口。」「庚戌，風浪不可行。」「辛亥，雨作，風稍緩。行至湖口縣。」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7，〈泛舟游山錄一〉，頁 436。

小結

上述以三角形水路網為主的鄱陽湖各航道，其重要性及所扮演的角色在兩宋時期各不相同。其中，南康軍與洪州（隆興府）之間的鄱陽湖—贛江吳城山汊道在北宋時開始取代鄱陽湖—贛江主泓道的角色，於春末秋初漲水期成為主要航道，到了南宋，秋末春初的枯水期也可承擔主要的航運功能。因此，在兩宋時期一直有頻繁的行旅舟行往來，為南北主要水路交通線的重要部分。相對而言，北宋時期洪州（隆興府）與餘干縣之間的贛江趙圍汊道—鄱陽湖—信江鄔子港汊道，以及餘干縣、饒州與南康軍之間的信江鄔子港汊道、鄱江—鄱陽湖水路就沒那麼重要，行旅往來的記載比較少，並非主要交通線。¹³⁶ 然而到了南宋時期，相關記載卻大幅增加，特別是贛江趙圍汊道—鄱陽湖—信江鄔子港汊道一躍成為重要的東西水路交通線，其間的差異恐怕與外部交通形勢演變有關。北宋定都開封，鄱陽湖流域及其周邊地區的水陸路交通多匯聚於江州，經此南來北往，或走陸路，由江州、獨木渡渡江，或走水路，循長江—汴河航線。¹³⁷ 因此，行旅舟行多循贛江吳城山汊道—彭蠡湖銜接長江水路。而南宋以臨安為「行在」，長江水路雖仍是最重要的橫向交通線，但錢塘江—信江水路的重要性大增，往來長江中游與嶺南循此較為便捷，吸引大批行旅利用此水路舟行往來。

肆・宋代贛江水路交通

在宋代，洪州（隆興府）以南的贛江水路交通往來極為頻繁。真宗以後，嶺南的「金銀、香藥、犀象、百貨」等皆陸運至南安軍或虔州後，再水運北上開

¹³⁶ 以鄔子港為例，目前僅見《太平寰宇記》有「鄔子港」的記載，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7，〈江南西道五・饒州〉，頁 2141。

¹³⁷ 吳修安，〈唐宋時期南北交通幹道新探〉，頁 78-82。目前所見，北宋時期走水路往來開封與長江中游、嶺南的行旅多循長江—汴河水路，如歐陽修於景祐三年（1036）前往貶所夷陵，張舜民於元豐六年（1083）徙「監郴州茶監酒稅」，蘇軾於紹聖元年貶「知英州」。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125，〈于役志〉，頁 1897-1905；張舜民，《畫墁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948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卷 7，〈郴行錄〉，頁 51-71；蘇軾著，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37-38，頁 2024-2057。

封；¹³⁸ 而虔州與南安軍所需的官鹽亦多自通、泰二州舟行運來。¹³⁹ 除了大宗貨物之外，行旅也多循此水路南來北往，其中就包括許多士人，因而留下不少文獻記載，¹⁴⁰ 特別是范成大與周必大的遊記，詳細記錄了這條水路的大部分行程。¹⁴¹ 從范成大與周必大的記載與其他士人的詩文，贛江水路由北而南大致會經過數十個停泊點，以下分段說明：

一・洪州（隆興府）至臨江軍段水路

洪州（隆興府）城西南廣潤門外的南浦亭是最主要的泊船處，由洪州（隆興府）出發，或抵達洪州（隆興府）的船隻大多會停泊在此。亦有少數船隻會停泊在城西章江門外的滕王閣下，如周必大在乾道八年五月返鄉途中，就曾「移舟滕王閣下」，並「挈家寓閣上」，¹⁴² 但這並不常見。由南浦亭南下，先後經石州夾（距隆興府十六七里）、蔣家灣（距隆興府三十里）、張家寨至生米鎮／生米市（距隆興府六十里，今新建縣生米鎮），四處皆可宿泊，其中生米鎮是最主要的泊船處。該地有生米渡，是洪筠間道必經渡口，重要性僅次於石頭渡。¹⁴³ 往

¹³⁸ 按：真宗咸平五年（1002），朝廷下詔計度廣南香藥泛舟走贛江「水運入京師」，但對於水運的起點有二說，《長編》與《宋史》皆謂陸運至南安軍，而《宋會要輯稿》則謂陸運至虔州，不知何者為是，二說並存。參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等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52，真宗咸平五年七月，頁 1143。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 46，〈水運〉，頁 7029；食貨 48，〈陸運〉，頁 7082；方域 10，〈遞鋪上〉，頁 9472。脫脫等，《宋史》卷 263，〈劉熙古傳附子蒙正〉，頁 9101；卷 307，〈凌策傳〉，頁 10128。

¹³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11，神宗元豐四年三月，頁 7548-7549。按：南宋虔州與南安軍亦是淮浙鹽的行銷區，參見梁庚堯，《南宋鹽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頁 90-194。又許懷林曾對北宋時期鄱陽湖流域水路上的官方物資進行粗略估算，參見許懷林，《江西通史・北宋卷》，頁 177-179。

¹⁴⁰ 就筆者所收集的資料就有姚鉉（968-1020）、歐陽修（1007-1072）、郭祥正（1035-1113）、蘇軾（1036-1101）、黃庭堅（1045-1105）、劉弇（1048-1102）、范成大（1126-1193）、周必大（1126-1204）、楊萬里（1127-1206）、朱熹（1130-1200）、趙蕃（1143-1229）、徐鹿卿（1189-1250）等人留下詩文或相關記載。

¹⁴¹ 參見范成大，《騷轡錄》，頁 48-50。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5，〈歸廬陵日記〉，頁 426-427；卷 169，〈泛舟游山錄三〉，頁 477-483；卷 170，〈奏事錄〉，頁 484-485；卷 171，〈南歸錄〉，頁 506-508。

¹⁴²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71，〈南歸錄〉，頁 506。

¹⁴³ 紹興元年，岳飛曾率兵經生米渡奇襲「連營西山」的「反賊」李成。岳珂編，王曾瑜校注，《鄂國金佗稗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5，〈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二〉，頁 151-153。

西經西山玉隆萬壽宮可至筠州與奉新縣，周必大在乾道三年十一月曾於此泊船三日，往遊玉隆宮；¹⁴⁴ 往東除可至隆興府城外，亦有「生米小路」至「舞陽渡」，通往饒信。¹⁴⁵

由生米鎮再往南，經下石溪、小灣、曲尺湖（距生米鎮二十餘里，今南昌縣崗上鎮曲湖村）後至市汊（距生米鎮四十餘里，今崗上鎮市汊街）。四處亦皆可宿泊，其中市汊「筠河向此出」，¹⁴⁶ 位在筠河（又名筠江、蜀江，今名錦江）匯入贛江處。筠河亦通舟楫，據《寰宇記》的記載，由筠州東至洪州「水路二百四十里」。¹⁴⁷ 元豐七年（1084），蘇轍由監筠州酒稅移官宣州績溪令，就「乘小舟出筠江」，循贛江至洪州。¹⁴⁸ 紹興年間，筠州的「民戶苗米」仍透過筠河運往臨江軍「輸納」，只是當時已遇到「以江道淺狹，而裝綱非便」的情況。¹⁴⁹ 職是故，市汊為一重要的泊船處，聚落甚為繁榮，周必大稱其「人煙甚盛，號新義鎮」，范成大亦形容其「緣岸居人，煙火相望，有樂郊氣象」。¹⁵⁰

市汊往南經稗堆步（距市汊十里，龍霧洲附近）、¹⁵¹ 撫州河口（今豐城市小港鎮大港口村）、栗絲灣、曲江鎮（距稗堆步數十里，今豐城市曲江鎮）至豐城縣（距曲江鎮十五里）。除撫州河口外，皆可泊宿，其中曲江鎮與豐城縣是最主要的泊船處，往來船隻大多會在兩地擇一泊宿，另一地則稍事停留。豐城縣的泊船處在寶氣亭，由於是縣城，士人官宦行旅為「應接人事」，會在此停留較久。¹⁵²

¹⁴⁴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9，〈泛舟游山錄三〉，頁 480-481。

¹⁴⁵ 楊萬里於淳熙十六年（1189）「祇召還京」，即由筠州經生米渡、舞陽渡前往臨安。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25，〈詩·江西道院集〉，頁 1315-1324；卷 26，〈詩·江西道院集〉，頁 1325-1366。

¹⁴⁶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9，〈泛舟游山錄三〉，頁 481。

¹⁴⁷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6，〈江南西道四·筠州〉，頁 2117。

¹⁴⁸ 蘇轍，《樂城集》卷 13，頁 308-311。

¹⁴⁹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 9，〈稅·受納〉，紹興三十年十一月三日條，頁 6179-6180。

¹⁵⁰ 參見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9，〈泛舟游山錄三〉，頁 481；范成大，《驂鸞錄》，頁 49。

¹⁵¹ 〈南歸錄〉載云：「相對即龍霧洲。」其地應在今豐城市同田鄉龍江村附近。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71，〈南歸錄〉，頁 507。

¹⁵² 如周必大在乾道六年四月，北上途經豐城縣時，停留五日與豐城官員士人們交游。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70，〈奏事錄〉，頁 485。

從豐城縣南下經赤岡頭（今豐城市尚莊街道赤崗村）、¹⁵³ 木湖灣、李家坪、樟鎮（又稱樟木鎮，今樟樹市）後至臨江軍（今樟樹市臨江鎮）。除赤岡頭外，四地皆可泊宿，其中樟鎮與臨江軍是最重要的二個泊船處。隆興元年（1163），楊萬里「赴調」由吉水前往臨安，途中泊船樟鎮，寫下了「日斜秋樹轉，市散暮船忙」的描述，可見當時的樟鎮已是重要的河港聚落。值得注意的是楊萬里並未繼續乘舟順流而下至隆興府，而是改陸行走撫州路，經楊塘店（今臨川區楊塘村）、撫州、長林（今東鄉縣長林村）接信江北岸的東西驛路幹道，東行經信州前往臨安，他並未明言捨舟登陸的地點，但應該就是在樟鎮或豐城縣。¹⁵⁴到了宋末，樟鎮更被形容為「繇南粵道贛右而下，繇蜀江轉重湖而上，左衡右廬，舟車百貨之會」，¹⁵⁵ 繁榮的程度已雄視贛湘。

而臨江軍位在袁水匯入贛江下游不遠處，如前所述，在晚唐五代時期，其前身蕭灘鎮就已是進出袁水水路的門戶，並於昇元二年升格為清江縣，其作為贛江中游水陸路交通與物資轉運的樞紐地位已經突顯。¹⁵⁶ 北宋淳化三年（992），在江南轉運使張鑑的建議下，更進而在此設置臨江軍，將周邊的贛江中游（新淦縣）與袁水下游（新喻縣）地區納入同一個統縣政區，「時以為便」，¹⁵⁷ 顯見臨江軍的設置主要源自行政管理上的需求。可以推測，清江縣設置後，「地當要衝」的蕭灘鎮已逐漸發展成為筠、袁、吉三州交界處的中心城市，周邊地區分隸不同政區已造成行政不便。由於臨江軍在水路交通運輸的重要性，北宋時期曾在臨江軍配置水運廂軍，¹⁵⁸ 顧名思義水運廂軍是供役於水路運輸，可見朝廷對贛中水路運輸的重視。南宋時期，臨江軍仍維持交通運輸的樞紐地位。乾道九年八月，周必大由廬陵赴任知建寧府，舟行至豐城時發文朝廷，「以疾告」，「乞宮祠」，隨即「返棹」至清江停泊，等待朝命。其所持的理由就是清江為交通要

¹⁵³ 嘉靖《江西通志》載云：「赤岡山，在豐城縣西北一十五里，山頻江壁立，上石皆赤。」林庭樞、周廣纂修，嘉靖《江西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2-183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卷 4，〈南昌府·山川〉，第 182 冊，頁 130。

¹⁵⁴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2，〈詩·江湖集〉，頁 72-81。

¹⁵⁵ 劉辰翁撰，萬萍點校，《須溪集》（收入《豫章叢書》集部五，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卷 1，〈記·五顯華光樓記〉，頁 530。

¹⁵⁶ 許懷林曾指出臨江軍的設置與該地為水陸交通樞紐及人員往來、物資運輸集散地有關，而這些特質其實在南唐時已經形成。參見許懷林，《江西通史·北宋卷》，頁 11-12。

¹⁵⁷ 脫脫等，《宋史》卷 277，〈張鑑傳〉，頁 9416。

¹⁵⁸ 脫脫等，《宋史》卷 188，〈兵志二·廂軍·建隆以來之制〉，頁 4657；卷 189，〈兵志三·廂軍·熙寧以後之制〉，頁 4685。按：全國僅潭州、泰州與臨江軍設置水運廂軍。

衝：「或有竄謫，近則湖南，遠則二廣。皆是路口，打包便行。萬一寬恩，止從罪免，又望外也。」¹⁵⁹ 當時許多人經江西前往湖南或廣西，都在臨江軍更換交通工具，如乾道三年十一、十二月，朱熹由湖南經江西返回崇安，陸行經袁州後，於「臨江買舟」，舟行贛江北上隆興府。¹⁶⁰ 乾道九年閏正月，范成大渡鄱陽湖，舟行贛江南下，赴任廣南西路安撫使，抵達臨江軍後，「初議詣宜春。出陸至此，則江道漸淺，大艘不可進，遂泊」，於是改行陸路前往袁州。¹⁶¹ 顯見當時臨江軍仍維持「舟車輻湊」的地位。另一方面，由於是州級政區治所，較縣治聚集更多的官宦士人，因此有更多「應接人事」的活動，官宦士人的舟船多會在臨江軍泊宿，其地點有二：一是郡治東的貢院（亦為行衙），一是郡城南二里的慧力寺。

二・臨江軍至吉州段水路

從臨江軍出發，先後經永泰市（今樟樹市永泰鎮）、黃家渡（今新淦縣三湖鎮黃家圍村）、石口（今新淦縣溧江鎮石口村）、青泥（在石口南五里）、神頭（今新淦縣金川鎮城頭村）至新淦縣，除神頭外，五處皆可宿泊。據楊萬里的記載，淳熙年間，有「無數小舟」航行在石口前後河段，¹⁶² 可見這段水路上船隻往來頻繁。其中，新淦縣是最主要的泊船處，而由永泰市去道教名山閻皂山僅三十里，是欲往遊閻皂山行旅的停泊處。¹⁶³

¹⁵⁹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90，〈書稿五・劄子二・劉文潛司業焯（乾道九年）〉，頁704。

¹⁶⁰ 朱熹撰，劉永翔、朱幼文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第20-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5，〈詩〉，頁389-402；卷75，〈序・東歸亂藁序〉，頁3627-3628。

¹⁶¹ 范成大，《騷轡錄》，頁50-52。按：范成大在《騷轡錄》中對臨江軍經袁州至潭州行程的記載，曾多次使用「泊」字：「十八日，至袁州。……泊報恩光孝寺。」「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泊袁州。」「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泊袁州。」「二十六日，宿萍鄉縣，泊萍實驛。」「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皆泊萍鄉。」似乎范成大是舟行袁水，但從「二十五日，……自離宜春，連日大雨，道上渾泥之漿如油。不知何人治道，乃亂置塊石，皆利面堅滑。與夫行泥中，則漿深汨沒；行石上，則不可著腳：跬步艱棘，不勝其勞」、「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數日，行江西道中，林薄逼塞，蹊徑軟側」的記載，「泊」不是指舟船停泊，而是指停留之意。

¹⁶²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24，〈詩・江西道院集〉，頁1263。

¹⁶³ 周必大載云：「庚寅，早移舟慧力寺下，……已初解去，風稍順，至石口亦暮夜，距清泥尚數里，離軍才四十餘里耳。終日對閻阜山，聞自永泰陸去可三十里，來歲當來遊。」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9，〈泛舟游山錄三〉，頁482。

由新淦縣往南，經蘆洲、峽江灘／市（今峽江縣巴邱鎮）、敖山、桐江（今吉水縣盤谷鎮同江村）、元潭（今吉水縣水田鄉富口村南）、白沙渡（今吉水縣黃橋鎮白石村）、元石灘（今吉水縣醪橋鎮元石村）、勞橋（今吉水縣醪橋鎮醪橋村）至吉水縣，除元潭、元石灘外，皆可宿泊。其中峽江灘、白沙渡和吉水縣是最主要的泊船處。楊萬里曾載云：「予嘗夜泊小舟於峽水之口，左右後先之舟，非吳之估，則楚之羈也。大者宦游之樓船，而小者漁子之釣艇也。」¹⁶⁴ 峽水之口即峽江灘，周必大就曾二度在峽江灘泊宿。又其地「直玉潤口，陸行十五里至玉筍山」，¹⁶⁵ 亦是前往道教洞天福地之一玉筍山的泊船處。如元祐四年（1089）八月十六日，原先知端州的郭祥正「請老」，舟行贛江北返途中，攜家往玉筍山「觀月」，遊覽玉潤橋與承天觀。¹⁶⁶ 可見不管是交通往來，或遊歷玉筍山，多會在峽江灘停泊，因而聚集了無數吳楚商賈與官宦漁夫的船隻。白沙渡則是廬陵士人宦游的必經之地，楊萬里家族聚居地湓塘里（今吉水縣黃橋鎮湓塘村）在白沙渡西約八公里處，而附近的羅陂為周必大友人羅子行的住處，周必大曾多次在羅子行家與該地文人交游。¹⁶⁷ 因此，楊萬里與周必大宦游多會在白沙渡宿泊。吉水縣在北宋已被描述為「前控大江，輸挽儲積，賈販所出入」，¹⁶⁸ 商販貿易與官宦「應接人事」多曾泊宿縣城，泊船處在縣城北門外的落霞亭／飛霞亭。¹⁶⁹

吉水縣向南經滑石灘、墨潭灣（今吉水縣文峰鎮南郊）、黃洲（今吉水縣文峰鎮磚門村）、梅林浦／渡¹⁷⁰（今青原區河東街道梅林村）抵吉州治所廬陵縣，除滑石灘、黃洲外，皆可宿泊。南宋紹興初年，知吉州李正臣曾描述吉州云：

¹⁶⁴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71，〈記·景延樓記〉，頁 2994-2995。

¹⁶⁵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52，〈平園續稿十二·序一·群玉詩集序〉，頁 218。

¹⁶⁶ 郭祥正撰，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合肥：黃山書社，1995），卷 28，頁 459。郭祥正雖未明確指出其船隻停泊何處，但可以推測應是泊船峽江灘。

¹⁶⁷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70，〈奏事錄〉，頁 484；卷 171，〈南歸錄〉，頁 507-508。

¹⁶⁸ 劉弇撰，劉宗彬點校，《龍雲集》（收入《豫章叢書》集部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卷 22，〈記上·吉陽持正堂記〉，頁 260。

¹⁶⁹ 趙蕃，《淳熙稿》（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257-2259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卷 9，〈吉水落霞亭觀程運使師孟留題作〉，頁 177。

¹⁷⁰ 劉弇〈送邢清臣赴左選〉詩云：「泊舟梅林浦，解纜墨潭灣。」〈發廬陵〉詩云：「雲航開急槳，勢奪編蒲風。黃洲轉頭失，旋指墨潭東。」劉弇，《龍雲集》卷 4，頁 56；卷 5，頁 70。

「四十萬之輸將，舳艫蔽水」，¹⁷¹ 顯示當時運送上繳中央稅賦的漕船布滿吉州的贛江河段。而廬陵由於是州城所在，聚集了較多的官宦士人，因此舟行經過吉州者，多會在此停留「應接人事」。¹⁷² 其泊船處有三：州城東北望雲門外的候春亭、¹⁷³ 州城南郊的齊虹亭 / 霽虹亭¹⁷⁴ 與霽虹亭南的凌波亭。¹⁷⁵

三・吉州至虔州（贛州）段水路

由吉州州城出發往南，先後經永和鎮（今吉安縣永和鎮）、白沙（今吉安縣永和鎮白沙村）、泰和縣至萬安縣，四地皆可泊宿。永和鎮為周必大家族的聚居地，周必大宦游皆以永和鎮為起訖地。除周必大之外，北宋建中靖國元年，蘇軾「自僊耳北歸」，與劉安世「同發虔州」北歸，兩人就曾在永和鎮停泊。¹⁷⁶ 可見永和鎮本就是贛江上一個重要的港埠。而泰和縣則被描述為：「控途水陸，道交

¹⁷¹ 李正臣，《大隱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36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影印），卷5，〈啟・吳運使啟〉，頁137。按：《宋兩江郡守替易考》〈吉州〉下無李正臣，但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李正臣於紹興元年十一月被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吉州」，三年六月還在任。不知李之亮排除李正臣所據為何？參見李之亮，《宋兩江郡守替易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413-414。

¹⁷²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269，〈泛舟游山錄三〉，頁482；卷170，〈奏事錄〉，頁484；卷171，〈南歸錄〉，頁508。

¹⁷³ 按：《輿地紀勝》載云：「候春亭，在望雲門外。」據民國《廬陵縣志》的記載望雲門在明初已廢：「明洪武初，割城東北隅，廢澄波、崇惠、清賦、平利、凝歸、望雲六門，外如下塘壠門猶存城址，或曰清賦即今倉庫門，凝歸舊名凝暉，在故城西北，望雲舊名古陽，在故城東北。」又：「勅建龍神廟，……案舊廟有二：……一在望雲門外，去縣五里，皆不詳所始。」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31，〈江南西路・吉州〉，景物門下，頁1373。王補、曾燦材等纂修，民國《廬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民國九年刊本影印），卷4，〈疆域志・古蹟〉，頁260；卷13上，〈禮典志・祠廟〉，頁1344。

¹⁷⁴ 據《輿地紀勝》所載，清暉亭在南亭下，霽虹亭在清暉亭下，凌波亭在霽虹亭下。而據民國《廬陵縣志》的記載：「南亭渡，在縣南三里，舊有亭。凌波渡，在縣南大碼頭，對河有凌波亭。」「南亭，在南柵門外，已廢。」「霽虹亭，在廬家巷上，已廢。」其地約在今吉州區永叔街道。王象之，《輿地紀勝》卷31，〈江南西路・吉州〉，景物門下，頁1373。民國《廬陵縣志》卷1下，〈疆域志・橋樑〉，頁146；卷4，〈疆域志・古蹟〉，頁283, 288。

¹⁷⁵ 王庭珪，《盧溪先生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3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嘉靖五年刻本影印），卷24，〈絕句・吉州凌波亭月夜〉，頁620。

¹⁷⁶ 蘇軾，《蘇軾詩集》卷45，頁2451。

廣者由之，行商往來，通貨南北」，¹⁷⁷ 亦是商旅舟行必經之地。其泊船處在城東快閣下（今泰和縣泰和中學內），¹⁷⁸ 周必大曾於此停泊。¹⁷⁹

從萬安縣南下則進入贛江水路最驚險的河段——十八灘，即前述所說的「贛石」，其險絕自東晉南朝以降，已為世人所熟知。十八灘起於萬安縣南的惶恐灘（舊名黃公灘），先後經漂城灘、延津灘、大蓼灘（又名大了灘）、小蓼灘、武朔灘（又名舞索灘）、崑崙灘、梁口灘、橫石灘、清洲灘、銅盤灘、落瀨灘、太湖灘、狗腳灘、小湖灘、磬機灘、天注灘（又名天柱灘）至鼇口灘（又名鼇口灘）等。自梁口灘以南屬虔州境，前後距離約三百一十五里，¹⁸⁰ 因此常以「贛石三百里」稱之。其間「江中巨石森聳如筍，水湍激」，「怪石如精鐵，突兀廉厲，錯峙波面」，¹⁸¹ 十八灘就是指這些江中巨石、怪石所形成磧石灘，因此原先以「贛石」稱之。由於十八灘連續分布於江中，「眾灘角巖嶮」，¹⁸² 造成水流湍急。磧石與湍急的水流正是影響船隻航行的二個主要因素，因此時人有「舟行其中，湍險萬狀」的描述。¹⁸³ 十八灘的「湍險」與惶恐灘以下「江流平澹」

¹⁷⁷ 嘉靖《江西通志》卷 24，〈吉安府·公署·泰和縣治〉，頁 232，引宋慶曆四年縣令王陶重建記。

¹⁷⁸ 泰和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泰和縣志》（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 759。

¹⁷⁹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5，〈歸廬陵日記〉，頁 427。

¹⁸⁰ 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下，〈十八灘〉，頁 105；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31，〈江南西路·吉州〉，景物門下，頁 1374-1375；徐鹿卿撰，郭曉雲點校，《清正存稿》（收入《豫章叢書》集部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卷 6，〈五言·出灘賦灘石〉，頁 539-540；沈興敬，《江西內河航運史（古、近代部分）》，頁 50-51。按：今萬安水庫兩岸仍殘留許多與十八灘相關的地名。如漂城灘（漂神灘），今萬安縣五豐鎮南西岸有漂神村。延津灘（棉津灘），今漂神村南有錦津村。大蓼灘，今萬安縣武術鄉有大蓼村。小蓼灘，今大蓼村南有新蓼村。武朔灘，今萬安縣南武術鄉。崑崙灘，今萬安縣彈前鄉東有地名崑崙。梁口灘，今萬安縣潤田鄉西南有良口村。橫石灘，今彈前鄉崑崙南有地名橫石。清洲灘，同治《贛縣志》云：「土牆頭塘，雞肋所載清洲灘在焉，舟人呼曰金沙閣。」小湖灘，今贛縣湖江鄉治前贛江中有小湖洲。黃德溥等修，褚景昕等纂，同治《贛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同治十一年刻本民國二十年重印本影印），卷 4，〈地理志·山川〉，頁 174。

¹⁸¹ 莊綽，《雞肋篇》卷下，〈不用上皇無道錢〉，頁 96；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64，〈梁紀二十〉，梁簡文帝大寶二年六月，胡三省引《章貢圖經》，頁 5069。

¹⁸²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 6，〈五言·出灘賦灘石〉，頁 539-540。

¹⁸³ 按：姚鉉於景德三年（1006）被貶為連州文學，由萬安縣舟行抵虔州。參見脫脫等，《宋史》卷 441，〈文苑三·姚鉉傳〉，頁 13055。

的情形有明顯的落差。¹⁸⁴ 其中，舞索灘和天柱灘「二灘尤險」，¹⁸⁵ 惶恐灘則因蘇軾詩中「地名惶恐泣孤臣」的描述，而聲名大噪，以致讓當時的士人有「聞之已為骨毛寒」的認知，然而實則「無甚險惡」。¹⁸⁶ 由萬安縣往南第一個泊船處就是惶恐灘，其後經造口／金船嶺（今萬安縣沙坪鎮長橋村東）、¹⁸⁷ 橫弦上（在今贛縣湖江鄉至儲潭鄉水口塘間）、¹⁸⁸ 儲潭（今贛縣儲潭鄉儲潭村）至虔州，五地皆可泊宿。趙抃於嘉祐六年赴任虔州途中，與黃得禮於元符二年（1099）冬天自虔州興國令離任北上途中，皆曾在惶恐灘泊宿，¹⁸⁹ 可見惶恐灘是進出十八灘河段前後重要的停泊處。儲潭則是由虔州北上進入十八灘前最後一個

¹⁸⁴ 《雞肋篇》亦載云：「始入吉州萬安縣界為安流。」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31，〈江南西路·吉州〉，景物門下，牛吼石條，頁 1382；莊綽，《雞肋篇》卷下，〈不用上皇無道錢〉，頁 96。

¹⁸⁵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 6，〈七言·之官過贛灘〉，頁 542-543。詩云：「玉局詩中惶恐灘，聞之已為骨毛寒。那知舞索并天柱，更向前頭作怒瀾。」

¹⁸⁶ 蘇軾，《蘇軾詩集》卷 38，頁 2052-2053；王阮，《義豐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63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宋淳祐三年刻本影印），頁 390；徐鹿卿，《清正存稿》卷 6，〈七言·之官過贛灘〉，頁 542-543。

¹⁸⁷ 按：趙抃離任赴召，虔州通判周敦頤曾送行至香林寺，趙抃詩云：「顧我入趨堯闕去，煩公出餞贛江頭。為逢蕭寺千山好，不惜蘭舫一日留。」周敦頤詩云：「公暇頻陪陸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別本云：「清獻自虔州赴召，舟至造口，同遊香林寺，石刻可考。」據《輿地紀勝》的記載，香林寺就在萬安縣南的金船嶺，又萬曆《吉安府志》載云：「金船嶺，在皂口。」參見趙抃，《趙清獻公文集》卷 3，〈七言律詩·和虔守任滿前人香林寺餞別〉，頁 717；周敦頤著，陳克明點校，《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3，〈遺文·詩·香林別趙清獻〉，頁 72；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31，〈江南西路·吉州〉，景物門下，金船嶺條，頁 1377；余之禎纂修，萬曆《吉安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據明萬曆十三年刻本影印），卷 12，〈山川·萬安〉，頁 191。又紹聖元年八月，蘇軾前往英州貶所，曾「宿造口」。參見蘇軾撰，張志烈等校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詞集卷 2，〈木蘭花令（梧桐葉上三更雨）〉，頁 703。

¹⁸⁸ 據同治《萬安縣志》，橫弦灘在鰲灘與天柱灘之間，而據同治《贛縣志》，橫弦塘在水口塘與下釜塘之間，下釜即狗腳灘。歐陽駿等修，周之鏞等纂，同治《萬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卷 1，〈方輿志·川〉，贛江條；同治《贛縣志》卷首，〈贛縣志圖·章水鄉圖〉，頁 49；魏瀛等修，鍾音鴻等纂，同治《贛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卷 6，〈輿地志·水〉，頁 136。

¹⁸⁹ 趙抃，《趙清獻公文集》卷 1，〈七言古詩·入贛聞曉角有作〉，頁 696；黃次山，《三餘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39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宣統秋館刻本影印），卷 1，頁 452。

吳修安

泊船處，徐鹿卿有詩云：「儲潭初發未早餐，一日經行十八灘。」¹⁹⁰ 而虔州「郡當二廣之衝，行者自郡易舟而北」，¹⁹¹ 是贛江水路南端最重要的港埠。

四·贛江河道性質與水路交通關係初探

由於河道性質的不同，贛江上游（自十八灘以上）與中下游水路舟船航行順利與否的條件並不盡相同。簡而言之，前者受制於贛江水位高低，後者則取決於風向與風力大小。就贛江中下游水路而言，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十五日，楊萬里舟行途經新淦縣石口河段南下時，曾賦詩云：

汭流淺木刺樓船，百棹千篙祇不前。一夜波聲喧到曉，北風氣力欲翻天。

掛帆未了青泥過，轉眼相將玉筍邊。無數小舟俱在後，……¹⁹²

清楚描述了汭流贛江時風向與風力對航行順利與否有明顯的影響：在北風大作之前，汭流而上的船隻，在江流的阻礙下，雖然奮力地搖槳撐船，但還是行進緩慢，甚至停滯不前；但在北風大作之後，汭流船隻掛帆起航，迅速從石口經過青泥、新淦縣，接近峽江灘旁的玉筍山。石口與玉筍山兩地相距約八十五里，可見楊萬里所乘船隻汭流航行之速。由此可知，風向與風力對舟船在贛江水路航行順利與否有關鍵性的影響。在周必大的日記中也記載了風向與風力對其航行贛江水路的影響：

乾道三年十一至十二月間，由南昌汭流而上，

庚辰，五鼓雨雪交作。乘風而行，辰時至生米鎮。……

壬午，……解維牽挽纜十餘里，宿下石溪。

癸未，無風，行甚緩，晚泊市汊。……甲申，無風，晡後過撫州河口，夜宿栗絲灣。

丙戌，風順，冒雨行四十里，……晚未至樟鎮七八里宿。

庚寅，早移舟慧力寺下，……已初解去，風稍順，至石口亦暮夜，……離軍才四十餘里耳。……辛卯，風正。已時至新淦縣，……壬辰，……辰後解舟，晚泊峽江灘下，非風力不能至也。¹⁹³

¹⁹⁰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6，〈七言·七月二十一日重過贛灘十絕句〉，頁546。

¹⁹¹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32，〈江南西路·贛州〉，風俗形勝門，頁1417。

¹⁹²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24，〈詩·江西道院集·十五日明發石口遇順風〉，頁1263。

¹⁹³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9，〈泛舟游山錄三〉，頁480-482。

乾道六年四月，由永和鎮順流而下：

戊子，……江漲風靜，俄頃至吉水，……

甲午，早發新淦，南風浩然。午後至臨江軍，……¹⁹⁴

乾道八年六月，由滕王閣泝流而上：

戊申，早，移舟慧力寺下，……午後方解去。晚宿永泰市。己酉，南風甚高。晚宿青泥，……庚戌，早至神頭之龍安寺，……

癸丑，早發新淦，南風甚高，僅行三十餘里，……

己未，早微有北風，舟人卜方擊鼓掛帆，得未曾有。僅行兩箭地，已轉南薰矣。¹⁹⁵

不管是順流還是泝流，都會受到風向與風力的影響。同樣是泝流，在同樣的季節，周必大於乾道八年六月的航行途中，經常受到南風的影響，以致行進甚慢。同樣是由新淦泝流，周必大一天僅行三十餘里，楊萬里則乘北風航行至八十里外的峽江附近。而在乾道三年冬季的泝流航行中，因多遇到北風，航行較為順利，由新淦至峽江也在一天內（辰時至酉時）。但也會遇到無風的狀態，在江流的影響下，只得「牽挽」而行，以致「行甚緩」。另一方面，在乾道六年初夏的順流航行中，不僅南風有助於航行速度，一天內（卯時至午時）由新淦縣行抵臨江軍，「風靜」狀態也無礙於航行。然而，順流而下會受到北風的阻礙，楊萬里就曾二度「舟行阻風」於循贛江水路北上途中。一次是在初夏，淳熙四年四月十日，赴任常州途中，因「舟行阻風」，「宿柵陂江口」，賦詩云：「出山似被北風嗔」，¹⁹⁶ 就是受北風所阻。一次是在仲冬，淳熙十一年（1184）仲冬，赴任京官途中，受阻於青泥。其詩云：「北風攔我泊青泥」，就是受北風攔阻；「江神風伯戰方酣，北浪吹翻總向南」，而且風勢甚為強勁，江流甚至被風吹著改變流向；於是「未放人扶下江柁，却教眼看上江帆」，不能順流而下，只能眼睜睜地看泝流船隻掛帆乘風而上。¹⁹⁷

贛江上強勁的暴風甚至會危及船舶安全，劉弇在「舟次生米」時，就曾遇到強勁的暴風：「東北有雲如搜墨，舟子熟視無人色。忽然白氣變飛翻，掬怒波神起乘隙」，顯然舟子們曾經這樣的暴風，而且甚為驚恐。暴風大作時，掀起的大

¹⁹⁴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70，〈奏事錄〉，頁 484。

¹⁹⁵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71，〈南歸錄〉，頁 507-508。

¹⁹⁶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8，〈詩·荊溪集〉，頁 441。

¹⁹⁷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19，〈詩·朝天集〉，頁 942。

浪，導致「大舟踉蹌愁失踞，小舟呼天手如額」。¹⁹⁸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贛江中下游河道所經之地，全年風向大多以北／北東北風為主，僅七月以南／西南風為主，六、八月南風與北風各半。¹⁹⁹ 歷史時期的風向也應該是大致相同，這就給帆船泝流而上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

而航行於贛江上游河道，更重視的是江水多寡，尤其是十八灘河段。據《泊宅編》的記載，「贛石數百里之險」，由虔州順流而下「若雨少溪淺，則舟舫皆以相待，有留數月者」。²⁰⁰ 而《輿地紀勝》亦載云：「六月舟行，每病乏水」，其原因在於「水落不能行」，²⁰¹ 可見舟行十八灘順流而下，最忌諱的就是江水缺乏補充，水位過低，導致舟行困難，其中尤以六月為甚。這是由於磧石灘接連不斷布滿江中，「若雨少溪淺」，水面上下盡是磧石，舟行其間會有觸礁翻覆的危險。但若是贛江水位上漲，情況則有所不同。建中靖國元年，蘇軾與劉安世「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因而賦詩云：「半篙清漲百灘空」，²⁰² 可見上漲的江水淹沒了磧石，使得贛石不再是威脅，船隻可以乘江流安全迅速地穿越十八灘抵達贛江中游。其他文獻亦有類似的記載，隆興元年六月，周必大舟行由虔州北上至萬安縣後，載云：「江漲，十八灘皆平。」²⁰³ 紹熙五年（1194）七月，林大中（1131-1208）於「知贛州」任上奉召返回臨安，「贛石至險，公欲行，不雨而水高數尺，怪石盡沒，俗謂清漲，殆出神助」。²⁰⁴ 這樣的情形似乎並不常見，再加上無雨而江水忽然上漲，以致人們將之歸因於「神助」。此神就是嘉濟廟神，廟在「城外水東五里」，「能使水清長」，「清長」即「清漲」，兩者皆謂「無雨」而江水增漲。嘉濟廟神「甚靈」，「或至誠禱之，則一夕長水數尺，送舟出石」，相傳虔守趙抃、周延雋與

¹⁹⁸ 劉弇，《龍雲集》卷5，〈古詩三·舟次生米值風作〉，頁71。

¹⁹⁹ 南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昌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頁218；清江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清江縣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35；新淦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新淦縣志》（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0），頁129-130；泰和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泰和縣志》，頁87-88。

²⁰⁰ 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編（十卷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3，頁17。

²⁰¹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32，〈江南西路·贛州〉，官吏門，周延雋條，頁1432。

²⁰² 蘇軾，《蘇軾詩集》卷45，頁2450-2451。

²⁰³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5，〈歸廬陵日記〉，頁427。

²⁰⁴ 樓鑰撰，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104，〈神道碑·簽書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學士正惠林公神道碑〉，頁1805。

曾阜「解郡罷守」後，欲順利舟行北返，皆曾「乞靈禱神」，結果「水輒生數尺」，或「水暴漲，十八灘皆平阜」。²⁰⁵

事實上，「清漲」主要有利於順流十八灘而下，若要汭流十八灘而上，「清漲」只是影響航行的因素之一。紹聖元年八月七日，蘇軾「初入贛，過惶恐灘」，賦詩云：「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減石鱗」，²⁰⁶ 明確點出了當時影響航行的兩個因素：持續的北風提供航行的動力，多雨溪漲則減少了礮石灘所造成的波滔。寶慶三年（1227），徐鹿卿自南安軍教授離任，舟行北上，「七月二十一日重過贛灘」，在其十絕句的詩作中留下若干描述航行贛灘的訊息：「聞道春江激滌時，灘平如掌棹如飛」，可知當時贛灘已為上漲的江水所淹沒，順流而下航行速度飛快：「儲潭初發未早餐，一日經行十八灘」，一天的時間就由儲潭穿過三百里贛灘。又云：「不似來時推不進」，反映順流與汭流間航行速度的巨大落差，進而寫到：「北來快順一篙駛，南去間關百丈牽」，順流北上僅需簡單的操控，而汭流南下則需費力牽挽。最後嘲諷地寫到：「下灘船看上灘船」。²⁰⁷

綜而言之，牽挽是汭流贛灘最主要的動力，其次才是風力，「清漲」則降低湍險程度。

五・虔州（贛州）以上水路

從虔州往上游還有四條水路，由西向東分別為：

1. 益漿水水路：據《輿地紀勝》的記載，郴州桂陽縣東有孤山水，「屈曲流一百五十里至益將，入上猶縣合江，通船至贛州」。²⁰⁸ 又據《寰宇記》，上猶縣境有益漿水，東流入貢水。²⁰⁹ 貢水為章水之誤，²¹⁰ 益將在湘贛交界處（今湖

²⁰⁵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32，〈江南西路·贛州〉，古蹟門，嘉濟廟條，頁 1429-1430；官吏門，周延雋條，頁 1432。方勺，《泊宅編（十卷本）》，卷 3，頁 17。按：洪适的〈嘉濟廟碑〉並未記載廟神能使贛江「清長」或「清漲」。參見洪适撰，凌郁之輯校，《盤洲文集》（收入《鄱陽三洪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卷 33，〈碑·嘉濟廟碑〉，頁 328-329。

²⁰⁶ 蘇軾，《蘇軾詩集》卷 38，頁 2052-2053。

²⁰⁷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 6，〈七言·七月二十一日重過贛灘十絕句〉，頁 545-546。

²⁰⁸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57，〈荆湖南路·郴州〉，景物門下，頁 2075。

²⁰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8，〈江南西道六·虔州·南康縣〉，頁 2183。

²¹⁰ 王元林，〈贛水上源各河流名實考〉，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編，《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探索與新動向：慶賀朱士光教授七十華秩暨榮休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頁 166-168。

南省汝城縣益將鄉），孤山水應是益漿水的上游，亦即從虔州可舟行章水、益漿水至上猶縣。

2. 章水水路：如前所述，真宗以來，來自嶺南的貨物與長江下游的海鹽或皆以南安軍為船舶運輸的起訖點，其所航行的水路就是章水。肩負南北貨物運輸的重責大任，是最主要的水路。

3. 桃水 / 龍南江水路：紹聖三年（1096），蘇軾的兒子蘇邁率領「數房賤累」，由宜興前往惠州與蘇軾相會，隔年閏正月，「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²¹¹亦即可以從虔州乘小舟航行龍南江至方口（今地不詳）。龍南江顧名思義是指流經龍南縣境的河流，而從龍南縣流至虔州的河流唯有桃水（今桃江），據嘉靖《贛州府志》的記載，桃水源自龍南縣境的冬桃山，流經龍南縣南、信豐縣東，後匯入貢水。²¹²龍南江應是指龍南縣境的桃水。蘇邁一行所走應是由虔州出發泝流而上，經貢水、桃水（龍南江）至方口，再陸行至循州。此為前往嶺南東部的間道。

4. 貢水 / 虔化水水路：創寺於仁宗朝的合龍山寺，位「贛縣東北五十里」，據傳其「經營之始，其師買木於虔化深谷中，距水百里，度非數船載輦不可到」，²¹³可知貢水支流虔化水可通舟楫。周必大曾舟行此水路至贛州，並留下詳細的記載。隆興元年，周必大「請祠」獲准，離京返回廬陵，因「急欲至姊家」，沒有按照預定的行程「出臨川、清江」，而是經南城、南豐、廣昌等縣至寧都看望其大姐，盤桓數日後，於寧都登舟順流而下返回廬陵。途中航經唐步虛、河東虛（今寧都縣田頭鎮渡頭村西南）、石城江口、白頭翁、白田、零都縣、七里鎮（今章貢區水東鎮七里村）至贛州。²¹⁴

後二條水路也具有前述贛江上游河道的特徵，據《章貢圖經》載云：「自贛水而上，信豐、寧都俱有石磧，險阻視十八灘。」²¹⁵周必大也記載了航經此段石磧灘的艱險：在「夜宿白頭翁」後，隔日「早入石」，可見虔化水的石磧灘在

²¹¹ 蘇軾，《蘇軾文集》卷 50，頁 1456；卷 55，頁 1632；卷 58，頁 1768-1769。

²¹² 康河修，董天錫纂，嘉靖《贛州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38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2，據明嘉靖十五年刻本影印），卷 2，〈山川〉，頁 95，123-124。

²¹³ 洪邁，《夷堅志》支志癸卷 8，〈合龍山小道者〉，頁 1271-1272。

²¹⁴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5，〈歸廬陵日記〉，頁 426。

²¹⁵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64，梁簡文帝大寶二年六月，胡三省引《章貢圖經》，頁 5069。

白頭翁以下河段；「水既澀，而舟人不熟河道，衝撞傾側，欲碎者數矣」，「未後暴風異常」更增加其航行的危險，以致「正觸亂石，危不可言」，因此「急令諸僕入水持舟」，「久之，風定方能去」。²¹⁶ 白頭翁與白田皆已不詳所在，但據嘉靖《贛州府志》的記載，零都縣境的寧都水上游有十二灘，其位置約在今瑞金市瑞林鎮至零都縣嶺背鎮間。²¹⁷ 周必大又記載，舟行過零都縣後，「過大灘一名梁面。亦險」，由於有先前的經驗，雇用了招灘者，「熟知河道，楫柁有方，賴以安然」。²¹⁸ 可見零都縣境的貢水河道亦有石磧灘，據嘉靖《贛州府志》的記載，零都縣境的貢水有灘六。²¹⁹

六·撫河（汝水）與袁水水路

撫河與袁水皆匯入洪州以上的贛江，其水路與贛江中上游水路相銜接，因此可以視為贛江水路交通的一部分。

宋代撫河亦可通舟楫，北宋中期，彭汝礪曾「自臨川泛舟還歸」，並留有詩作。²²⁰ 靖康元年十二月（1127），李綱由建昌軍貶所再謫居寧江軍，「即泛舟由臨川如豫章」。²²¹ 其應是走撫河主泓道，由豐城縣北的撫州河口進入贛江，再至洪州。是時撫州河道似乎也因河沙壅塞而影響航行。據明清方志的記載，元祐六年（1091），江西轉運使張商英曾「疏鑿盱水以通運道，然水勢蕩沙，不時壅塞，春夏可通舟楫，秋冬止容行筏而已」，²²² 然此事不見於宋代文獻，尚待考證。但南宋前期，張孝祥在寓居臨川一年後離去時，有〈去臨川書西津漁家〉

²¹⁶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5，〈歸廬陵日記〉，頁 426。

²¹⁷ 嘉靖《贛州府志》：「寧都，……上流有灘十二：曰葛激、曰八瀨、曰井洲、曰鷓鴣、曰藥口、曰大湖、曰車頂、曰小萬、曰苦竹、曰長灘、曰率口、曰牛牯。」按：葛激，今瑞金市瑞林鎮長沙村東有地名葛練；井洲，今零都縣銀坑鎮東南有井洲村；率口，今零都縣嶺背鎮嶺背村有地名率口排。嘉靖《贛州府志》卷 2，〈山川·零都縣·水〉，頁 91。

²¹⁸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5，〈歸廬陵日記〉，頁 426。

²¹⁹ 嘉靖《贛州府志》：「貢，……灘凡六：曰葛步、曰三壩、曰梁面、曰三門、曰上灘、曰磨車。」嘉靖《贛州府志》卷 2，〈山川·零都縣·水〉，頁 91。

²²⁰ 彭汝礪，《鄱陽先生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2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鈔本影印），卷 10，〈律詩·自臨川泛舟還歸因假前韻寄粹老提舉朝議兼簡知府龍圖丈四首〉，頁 115。

²²¹ 李綱，《梁溪先生文集》卷 136，〈序三·靖康行紀序〉，頁 472。

²²²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86，〈江西四·建昌府·南豐縣〉，頁 3982。

詩云：「作客臨川又一年，却尋歸路淺灘舡」，²²³ 明確指出航行撫河為適合淺灘的船隻，反映當時撫河河道已多泥沙淤積，影響舟船航行。

宋代的袁水亦是重要的水路，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紹興年間，袁州的「民戶苗米」與「支移苗米」皆是透過袁水水路運往臨江軍「輸納」與「寄倉送納」。²²⁴ 淳熙年間，楊萬里亦曾載云：「袁之庾，僑於臨江舊矣。」其背景就在於「蓋袁之為州，地陬田寡，粟財堇堇」，於是「州民必山伐陸取，方舟乘流，貿之臨江，易粟以輸」，²²⁵ 亦即袁州民眾所輸納的「苗米」，大多是民戶利用袁水水路運送貨物至臨江軍貿易，換取而來的。但袁水河道有「江道淺狹」的特性，限制水路交通運輸的進行，特別是在冬季前後。紹興年間，由袁州運往臨江軍的「民戶苗米」，就遇到「江道淺狹」，以致「裝綱非便」的情況。²²⁶ 而袁人也苦於要親赴臨江軍繳納「支移苗米」，因此「嘗乞就本州送納」，並自出「水腳錢」，「候春水泛，乃起發」，運送至臨江軍。²²⁷ 可見春季江水泛漲後，「江道淺狹」的情況會比較和緩。冬季前後，袁水河道不利航行還可從前引朱熹與范成大的經歷得到印證，兩者在途經袁州時皆不走袁水水路，前者是在冬季（十一、十二月），後者則是在初春（閏一月，但仍有「大風急雪」），欲由臨江軍前往袁州時，已是「江道漸淺，大艘不可進」的情況。

小結

整體而言，洪州（隆興府）至虔州之間的贛江主流與其他支流的航行條件有明顯的不同，前者航道較深，水量豐沛，可航行的船隻較大，四季皆可通航，為

²²³ 張孝祥著，辛更儒校注，《張孝祥集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卷 6，頁 233。

²²⁴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 9，〈稅・受納〉，紹興三十年十一月三日條，頁 6179-6180；食貨 10，〈稅・賦稅雜錄下〉，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條，頁 6198。

²²⁵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129，〈墓志銘・夏侯世珍墓誌銘〉，頁 5006。前引《宋會要輯稿》對「支移苗米」亦載云：「比年江西米賤錢荒，民皆賤糴米而貴買金帛，至臨江軍賤賣之，復貴價糴米輸納。」可見袁州民戶皆至臨江軍購買苗米輸納。

²²⁶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 9，〈稅・受納〉，紹興三十年十一月三日條，頁 6179-6180。

²²⁷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 10，〈稅・賦稅雜錄下〉，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條，頁 6198。此事亦見楊萬里所撰〈夏侯世珍墓誌銘〉，據其所載：「袁之庾」最終遷於分宜縣，但夏侯世珍在遷移之前曾「以不便民白州」，但「主計不從」，因此「至今民病之」。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129，〈墓志銘・夏侯世珍墓誌銘〉，頁 5006。

主要航線；後者航道較淺，甚至為淤沙所困擾，只能航行小船或竹筏，在秋末春初的枯水期，會影響航隻航行，或至無法通航，為次要或輔助航線。在兩宋時期贛江水路一直扮演溝通京畿與嶺南的角色，為南北主要水路交通線。不同之處在於，南宋時期東西交通重要性大增，贛江洪州至臨江軍河段亦成為臨安經由袁水河谷往來湖南與廣西的水路交通要道，往來行旅多在臨江軍稍作停留，以更換船舶或轉換交通方式。因此，贛江水路的交通運輸較北宋時期更為繁盛。

伍・宋代信江、鄱江與修水水路交通

鄱陽湖泛漲時，信江、鄱江與修水皆直接匯入鄱陽湖，其水路最終與前述鄱陽湖三角形水路網相連接，因此於贛江水路交通之外，另立章節以為區隔。

一・信江水路

信江水路上的舟船往來在南宋時期變得極為繁盛，是行在所臨安府及其所在的兩浙地區與贛江、湘江流域、嶺南諸州間舟行往來必經的水路。從宋代士人所留下的詩文記載中，信江水路由餘干縣泝流而上會先後經過下列十數個停泊地點：

1. 餘干縣至貴溪縣段水路：由餘干縣泝流循餘干水而上，先後經餘干江口（距餘干縣十五里）、安仁縣（今餘江縣錦江鎮）、金沙渡（今貴溪市濱江鎮金沙村）²²⁸至貴溪縣，除了餘干江口外，皆可泊宿。餘干縣「邑當孔道」，²²⁹是信江水路最重要的停泊處之一，由於餘干水在此分流，餘干縣成為三條水路的交會點，因此許多行旅會在此更換船隻，以利變換水路。如趙蕃曾由玉山舟行順流而下，「八月到餘干，易舟，又二日抵鄱陽城」。²³⁰淳熙六年十月，趙蕃在泰和縣「送成父弟絜兩房幼累歸玉山」，曾賦詩云：「清音堂下換船處，想見掛帆灘已空。」²³¹清音堂就在餘干縣，「與琵琶洲相對」，可「下瞰琵琶

²²⁸ 按：范成大曾「宿金沙渡」。范成大，《驂鸞錄》，頁47。

²²⁹ 程秘，《程端明公洛水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71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卷15，〈行狀・朱惠州行狀〉，頁140。

²³⁰ 趙蕃，《乾道稿》卷下，頁11。

²³¹ 趙蕃，《章泉稿》（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2026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卷4，頁74。

洲」，²³²南宋時成為干越亭、思禪寺之外，另一重要泊船處，許多文人都曾登清音堂觀覽風景，並留下題記。²³³安仁縣的泊船處在縣治前雲錦驛，²³⁴趙蕃曾詩云：「頻乘信州船，屢泊雲錦驛」，²³⁵可見雲錦驛是信江水路上一個重要的停泊點。貴溪縣的泊船處則在縣治對面信江南岸，趙蕃舟行途經貴溪時曾於南岸的黃巖與徐巖遊歷，其詩云：「扁舟半載泊南岸。」²³⁶周必大在隆興元年由臨安返回廬陵途中，就在信江南岸的徐巖三山堂停泊。²³⁷貴溪縣亦是「捨舟登陸」，陸行前往撫州、建昌軍的轉運站。周必大在泊舟三山堂下後，隨即「捨舟」，隔天陸行南下，經金谿、建昌軍前往虔州寧化。²³⁸趙蕃亦曾在貴溪「出陸」，「捨舟覓籃輿」。²³⁹事實上，信州與隆興府（洪州）、撫州、建昌軍間的陸路交通線，多經由本河段渡河，可見當時餘干、安仁與貴溪縣在交通區位上的重要性。

2. 貴溪縣至信州段水路：從貴溪縣再泝流而上，經桃花臺／步（今弋陽縣圭峰鎮圭峰村境）、小箬（今弋陽縣清湖鄉南）、²⁴⁰漁浦、弋陽縣、大琛山（今鉛山縣西黛琛山／大青山）、赭亭山（與大琛山相對，今橫峰縣南）、霍毛渡、汭口鎮（今鉛山縣治）、唐羅步／旁羅灘（今鉛山縣鵝湖鎮傍羅村）至信州。其中，桃花臺位在著名景觀龜峰之下，龜峰以其特殊的丹霞地貌特徵，成為士人行

²³²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23，〈江南東路·饒州〉，景物門下，頁 1038；外邑詩門，頁 1065。

²³³ 目前所見有張孝祥（1132-1170）〈登清音堂其下琵琶洲也再用韻〉、王十朋（1112-1171）〈次韵安國題清音堂〉、趙彥端（1124-1175）〈好事近（廬食判席上）〉、喻良能〈登清音堂〉、趙蕃〈登清音堂訪介庵壁間留題，已有漫去之者，偶成長句〉等。

²³⁴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 85，〈江西三·饒州府·安仁縣〉，錦江條，頁 3958。

²³⁵ 趙蕃，《淳熙稿》卷 3，頁 59。按：李綱有〈宿安仁雲錦堂〉詩云：「一宿溪邊雲錦堂，……沙平水澹近江浦，……」可知雲錦驛在信江岸。見李綱，《梁溪先生文集》卷 14，頁 359。

²³⁶ 趙蕃，《淳熙稿》卷 5，頁 82-83。

²³⁷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5，〈歸廬陵日記〉，頁 423。

²³⁸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5，〈歸廬陵日記〉，頁 423-425。

²³⁹ 趙蕃，《淳熙稿》卷 4，頁 75。

²⁴⁰ 楊萬里於紹熙三年行部，由上饒舟行信江，曾泊舟小箬。亦是陸行弋陽與貴溪間必經之地。按：清湖鄉在弋陽縣西，其南虎山村、廟腳村境有地名筏箬張家與筏箬方家。參見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35，〈詩·江東集〉，頁 1796；《江西省地圖集》編纂委員會編，《江西省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8），「弋陽縣」圖幅，頁 334-335。

旅在舟行鉛山至貴溪河段時最吸引人的地貌景觀，為了遊歷龜峰，經常停泊在桃花臺下。²⁴¹ 周必大於隆興元年五月舟行經過龜峰時，本因「溪湍不能艤岸」，後卻「強舟人使泊」桃花步，以便前往遊歷龜峰。²⁴² 汭口鎮位在鉛山江口，「鎮居往來之衝」，²⁴³ 往南經鉛山縣至崇安縣為進出閩地的交通要道之一。而上饒城則是信江水路的起訖點，又是州治所在，因此士人行旅多在此更換交通工具，以及「應接人事」。如隆興元年五月，周必大由嚴州陸行至衢州後走江山路，經永豐縣至信州城，在此盤桓數日「應接人事」後，才登舟順流而下。²⁴⁴ 乾道九年正月，范成大由衢州陸行走常山路，經玉山至信州，亦在此停留數日，「自此復登舟」，舟行信江。²⁴⁵ 信州城泊船處在廣信門外，廣信門為「城之南門」，「內直郡庾，……外連長橋」，為「州之要衝」。²⁴⁶ 門外即信江，因此「俗乎水門」，行旅過客亦在此「維舟」，淳熙十年（1183），知信州錢象祖新修仁智亭，兩亭間榜曰「明暉閣」，「背谿面城」，屋宇一新，成為「候館之最」。²⁴⁷ 紹熙三年，江東轉運副使楊萬里行部至信州，就於明暉閣前解舟，返回建康。²⁴⁸

3. 信州至玉山縣段水路：信州至玉山縣間河段亦可通舟楫，據《寰宇記》引《舊記》的記載，玉山縣治上流的「上干溪水」，「溪源乾淺，秋冬不通舟船」。²⁴⁹ 依此上干溪水在春夏是可通舟楫的，那麼位在上干溪水下流玉山縣治以下的上饒江當然也可行舟。又《輿地紀勝》引《上饒志》云：「上干溪所經

²⁴¹ 據筆者所見，曾經留下有關桃花臺詩文的士人至少有趙抃、周必大、范成大、楊萬里、陳文蔚、喻良能、趙蕃等人。

²⁴²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5，〈歸廬陵日記〉，頁 422-423。

²⁴³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集》（收入《呂祖謙全集》第 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卷 13，〈張監鎮墓誌銘〉，頁 196。

²⁴⁴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 165，〈歸廬陵日記〉，頁 421-423。

²⁴⁵ 范成大，《驂鸞錄》，頁 47。

²⁴⁶ 孔武仲撰，聶言之點校，《宗伯集》（收入《豫章叢書》集部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卷 12，〈記·信州新修廣信門記〉，頁 295-296。

²⁴⁷ 王寧，〈仁智亭記〉，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 280 冊，頁 210-211。按：目前所見此文最早出自嘉靖《廣信府志》。

²⁴⁸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35，〈詩·江東集〉，頁 1798。

²⁴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7，〈江南西道五·信州·玉山縣〉，頁 2155。

處，間與衢之常山接。自信而衢，不可舟行，而間以陸運者，此而已矣。」²⁵⁰
亦即上干溪是可舟行。

二・鄱江水路

除了圍繞鄱陽湖所形成的三角形水路網，以及向外延伸的三條水路——彭蠡湖北段、贛江與信江所形成的水路交通主幹道之外，還有二條次要水路——鄱江與修水，這二條水路最終也連接到南康軍—隆興府—餘干縣間的三角形水路網。

鄱江水路有二：一是昌江水路，一是樂安江水路。後者的上游為婺水，據淳熙《新安志》的記載，其水環繞婺源縣城而下，「二百石」的船隻可由婺源縣城「舟行通鄱陽江」。²⁵¹ 前者在唐後期已是饒州與徽州間重要的水路運輸交通線，徽州所需的貨物與外銷的茶貨皆循此水路往來運輸。到了宋代仍持續作為饒徽間的交通運輸線，尤其是宋室南遷後，鄱江水路成為東西交通通道之一，由臨安府西經於潛縣、徽州，可「由鄱江達荆、湖、湘、漢、巴蜀諸道」，²⁵² 徽州所走的鄱江應是指昌江水路。是時由饒州泝流而上，先後會經景德鎮、浮梁縣、城門村（今浮梁縣興田鄉城門村），最後至祁門縣閭門外。紹興元年七月，江東賊張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又別遣水軍，分道自景德鎮來犯」，²⁵³ 據此景德鎮以下昌江水路暢通無阻。而紹熙三年，時任江東轉運副使的楊萬里自建康行部視囚，至徽州後取祁門路，於閭門外登舟，順流而下，在浮梁縣境棄舟登陸，南下經樂平縣至信州。²⁵⁴ 其在「舟過城門村」時，詩云：「忽有高聲仍絕叫，隔篷知是上灘船」，可知在景德鎮以上河段舟船順流、泝流甚為平常。值得注意的是楊萬里在〈過閭門溪〉詩自注云：「復立雙石刺天如門，溪水過雙石之間極險，名曰閭門，……門外乃可登舟。」²⁵⁵ 亦即舟船不過閭門灘，前述咸通三年縣令陳甘節所興建的水利工程應該已喪失作用。

²⁵⁰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21，〈江南東路·信州〉，景物門下，頁 960。

²⁵¹ 趙不悔修，羅願纂，李勇先校點，淳熙《新安志》（收入《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甲編》第 8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卷 5，頁 131, 136。

²⁵² 潛說友纂，咸淳《臨安志》（收入《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 1-3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卷 21，〈疆域六·橋道·於潛縣〉，頁 591。

²⁵³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46，紹興元年七月辛酉條，頁 970-971。

²⁵⁴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34-35，〈詩·江東集〉，頁 1770-1789。

²⁵⁵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34，〈詩·江東集〉，頁 1770。

三・修水水路

關於舟行修水的相關記載目前僅見黃耑所編纂的《山谷年譜》，據其所載黃庭堅曾二度舟行修水：元豐六年十二月（1084），從泰和「歸舟自湖濱入修江，由武寧而至分寧」；紹聖元年六月，「自分寧赴宣城，舟行由海昏過城下」。²⁵⁶亦即由分寧可循修水，舟行順流而下，經武寧、建昌入鄱陽湖。值得注意的是黃耑在紹聖元年五月條引〈與李獻父書〉云：「庭堅但須分寧卸鹽船空即解維，後月初必獲參展。許借兩舟至海昏，盛暑，使賤累少得清涼，實受賜也。」據此分寧官鹽是由鹽船載運循修水汭流而上。但此段文字與黃耑所編《山谷別集》中的〈與李獻父知府書〉卻有所出入，前段文字不見於〈與李獻父知府書〉。²⁵⁷黃耑為黃庭堅堂弟黃叔敖之孫，得以接觸許多「家藏」的真跡、石刻資料，²⁵⁸因此其所述內容應有所據，何者為是，待考。

²⁵⁶ 黃耑編，曹清華校點，《山谷年譜》（收入《宋人年譜叢刊》第5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卷17，元豐六年十二月，頁3034；卷26，紹聖元年五月至十月，頁3072-3074。

²⁵⁷ 黃庭堅撰，劉琳等校點，《黃文節公全集·別集》（收入《黃庭堅全集》第2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卷15，頁1773-1774。

²⁵⁸ 淺見洋二，〈黃庭堅詩注的形成與黃耑《山谷年譜》——以真跡及石刻的利用為中心〉，周裕鍔編，《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1），頁378-379。按：淺見洋二以黃叔敖為黃庭堅從弟，但二人的祖父同為黃湜，其關係應為堂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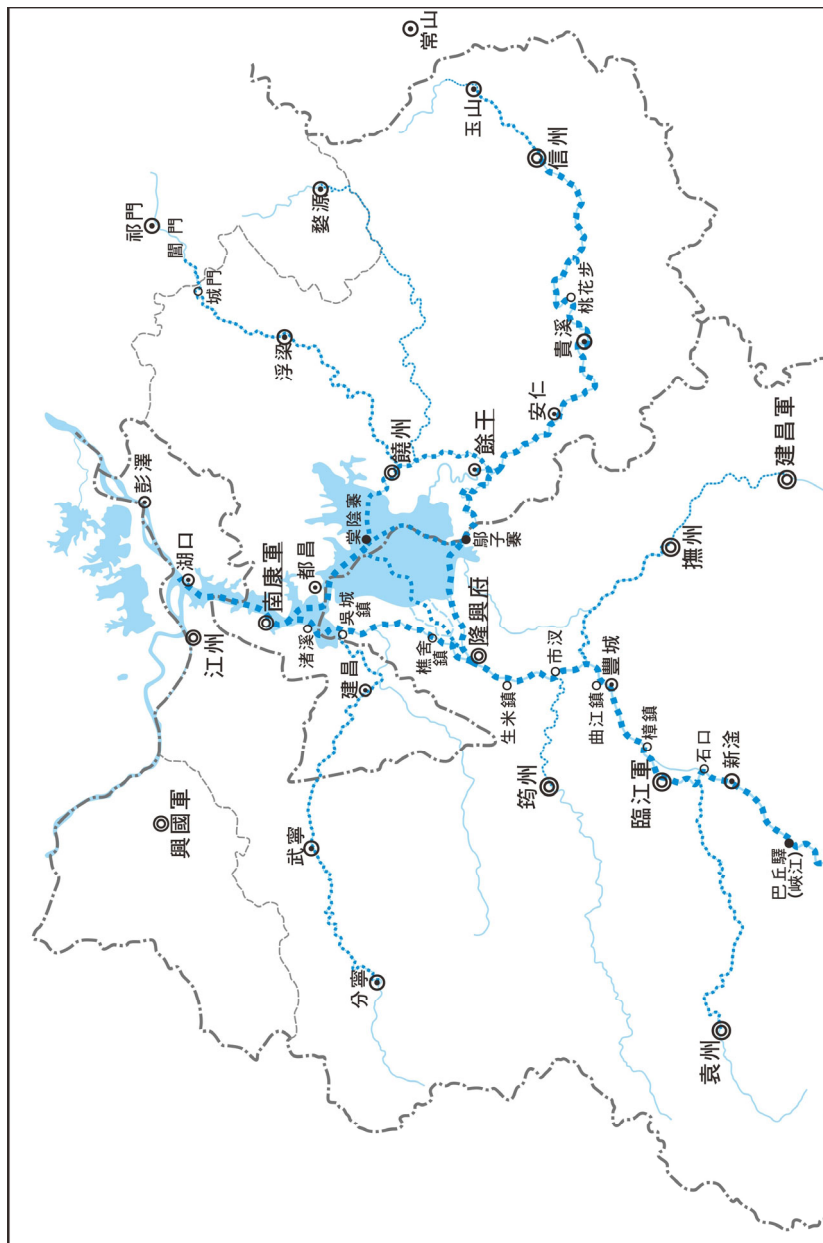


圖 3：宋代江西地區水路交通示意圖（上幅）

（本圖為筆者繪製，行政建置斷代為南宋嘉定元年〔1208〕，以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6 冊，「南宋・兩浙西路、兩浙東路、江南東路」與「南宋・江南西路」圖幅為底圖）

陸・水陸相兼：水路與陸路交通的銜接

雖然優越豐富的水文環境，使得舟行水路成為中國南方極為重要的交通運輸方式。但是由於河流水文條件的限制，包括固定的河流走向、流域間存在分水嶺、以及各河流、河流主支流與上下游之間的航行條件不同等等，商旅並不總是只單純使用水路舟行往來與運送物資。為求縮短路程、銜接相鄰流域水路或避開航行條件不佳的水路，陸路成為不得不或更好的選擇，於是水陸相兼成為商旅經常採用的交通運輸方式，兩者行經的路線共同構成完整的交通網絡，商旅可依其需求或實際狀況選擇交通運輸方式與路線。

就筆者的考察，唐中後期江西的陸路交通以一條穿境而過的南北驛路幹道為主軸。該驛路始於兩京，通往廣州等嶺南東南部諸州。其路線由洛陽東南行，經許、蔡、申、安、黃、蘄等州，由獨樹浦渡江至江州，進入江西境內；其後循廬山西麓南行，經楚城、甘泉、蒲塘（今德安縣）、若峴等驛至建昌縣，後渡修水，經石頭驛渡贛江至洪州；接著沿贛江南行，經豐城劍池驛、吉州、泰和白下驛至虔州；再轉西南經潭口驛、南康縣、大庾縣、大庾嶺北驛、半亭驛，越大庾嶺進入嶺南。境內其他諸州與若干相鄰州至兩京的驛路，以及江西與周邊地區往來的道路皆連接至此幹道上，形成若干條東西向的交通線。其中比較重要的路線有二：一是沿信江河谷平原的東西向交通線，連接贛江下游與錢塘江流域。其中有部分路段是信州至兩京的驛路（信州至餘干縣），該驛路由信州循信江北岸西行，經弋陽縣至餘干縣境後北行，經饒州至馬頰檀頭渡，渡彭蠡湖至江州接驛路幹道。若從餘干縣境繼續西行，經城子橋、武陽館，可至洪州接驛路幹道。而從信州東北行，經玉山縣、常山縣至衢州，則可連接另一條南北驛路幹道（一般稱之為東線），通往江南與兩京。二是沿袁水河谷平原的東西向交通線，連接贛江中游與湘江流域。由袁州東行經新喻縣鍾山館、黃蘗館後，渡贛江至新淦縣接驛路幹道；往西則經萍鄉縣、香館、醴陵縣進入湘江流域，可連接另一條南北驛路幹道（一般稱之為西線），通往荊襄與兩京。而袁州至兩京的驛路則是東北行經高安至洪州。兩者在江西初步構成一條東西向的陸路交通線，連結當時東南地區三個主要流域——錢塘江、贛江與湘江流域。²⁵⁹

²⁵⁹ 吳修安，〈唐代江西地區的陸路交通——以驛路為中心〉，《白沙歷史地理學報》20（2019）：61-87。

就目前所見，有唐一代採用水陸相兼交通方式的大多數是途經江西的跨境長途行旅，或為縮短路程，或需走陸路越過流域間的分水嶺以銜接水路。前者如宋之問於神龍元年（705）前往貶所瀧州時，並未走路程較遠的大運河水路繞行南下，而是先由洛陽走陸路東南行，經贛州黃梅縣渡江，至洪州後才改走水路，舟行贛江汭流而上，後於大庾縣又捨舟登陸，越大庾嶺進入嶺南。²⁶⁰ 捨舟登陸翻越分水嶺通常是南方跨境水路交通需要採行的方式，如天寶九年鑒真由廣州北返揚州時，就先「乘江七百餘里」至韶州，陸行過大庾嶺至虔州後才又舟行北上。²⁶¹ 前述李翱在元和年間由洛陽舟行南下嶺南時就二度捨舟登陸：由錢塘江上游的常山縣翻越玉山嶺至信江上游的玉山縣，以及由贛江上游的大庾縣翻越大庾嶺至北江上游的潯昌縣，再登舟順流而下。大宗貨物的運輸也可能透過水陸相兼的方式，陸運翻越分水嶺以銜接水路。僖宗乾符初，在宰相鄭畋的建請下，嶺南東道節使、廣州刺史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²⁶² 此前為了因應與南詔爭奪安南的戰事（咸通元年至七年，860-866），運往嶺南的軍糧有二條路線，先是由江西、湖南等內陸諸道漕運，「皆泝湘江入零渠、灘水」，後在陳礪石的建議下，又從淮南、兩浙與福建等沿海諸道和雇商船運米泛海南下。²⁶³ 從乾符初由嶺南東道節使、廣州刺史韋荷在接近大庾嶺的虔、吉二州購買米糧，並停止荆南與江西等地的漕運推測，這批軍糧應該不是循贛江—長江—湘江—靈渠—桂江水路繞行運往安南，而是選擇最短路程，透過陸運翻越大庾嶺銜接贛江與北江水路，水運至廣州後再泛海運至安南。同樣翻越分水嶺的水陸相兼路線還出現在以下三段：走吁江水路至南城縣後，改走陸路東南行經飛猿館至建州邵武縣；舟行袁水至袁州後，改陸路西行經萍鄉縣至潭州；由虔州舟行貢水至瑞金場後，改陸路翻越新路嶺至汀州。

到了宋代，循廬山西麓、贛江的南北驛路仍舊是江西主要的陸路交通幹道，只是在南、北宋時期的角色與地位有所變化。與唐代大致相同，該驛路由江州九江驛南下，沿廬山西麓南行經德安、建昌等縣至石頭渡，渡贛江至洪州後再沿贛江東岸南下，經豐城、新淦、吉水等縣至梅林渡，渡贛江至吉州後，南下至泰和

²⁶⁰ 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宋之問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2，頁 421-431。

²⁶¹ 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頁 74-76。

²⁶²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185，〈鄭畋傳〉，頁 5402。

²⁶³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9，〈懿宗紀〉，頁 652-653，656-657；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50，懿宗咸通四年七月，頁 8105-8106。

縣渡江，至萬安縣再渡江，往南沿贛江西岸至虔州，從虔州西南行經南康縣、南安軍至懷化驛，後越大庾嶺進入嶺南。北宋時，該驛路由江州渡江至獨木渡（即獨樹浦）後，西北行經蘄、黃、光、蔡等州至開封，是當時縱貫南北的交通幹道之一。是時在這條驛路上還延伸出一條支線：由建昌縣南行經奉新縣、筠州至臨江軍。到了南宋，這條南北驛路幹道不再通往北方的政治中心，重要性下降，但仍是江西境內南北往來的幹道，尤其是洪州以南路段成為湖南與嶺南通往新政治中心臨安的主要路線。此時最大的變化是隨著政治中心的東南移，東西交通路線的重要性大增，在江西境內形成兩條東西交通幹道：一是大體循長江南岸的驛路，東段由江州東行渡彭蠡湖口，經湖口縣至池州，通往臨安，西段由江州南下至楚城驛，轉東行至興國軍，通往荊湖與巴蜀；二是大致沿信江與袁水河谷平原，東段由隆興府（即洪州）東南行經武陽渡、進賢縣、潤陂橋（即城子橋）至餘干縣，再循信江北岸東行經安仁縣、貴溪縣、弋陽縣、信州至玉山縣，越玉山嶺經常山縣通往臨安，西段由臨江軍西南行經新喻縣、分宜縣、袁州、萍鄉縣，出江西後經裏田驛、醴陵縣，通往湖南與嶺南西部。兩者與原來的南北交通幹道共同形成「干」字形的交通主軸。

而就在兩宋時期，隨著對江西丘陵山地墾殖的深入，許多翻越各河流水系間丘陵山地的道路陸續被開闢，與「干」字形交通幹道大致形成以鄱陽湖為中心的向心狀網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兩大水路交通線——信江與贛江之間的兩條陸路交通線，皆橫穿撫河流域，連接兩地的港埠城鎮：一是由安仁縣西南行至撫州，再西行至豐城縣，或經崇仁縣至新淦縣；二是由貴溪縣西南行經金谿縣至建昌軍，再往南經南豐、廣昌、寧都等縣至贛州。²⁶⁴ 由於走陸路交通幹道往來臨安與湖南、嶺南，需繞道隆興府，因此這兩條路線就成為縮短路程的捷徑，許多舟行信江與贛江水路的行旅也會面臨同樣的情境——需繞行鄱陽湖，因而利用這兩條陸路。如前述楊萬里於隆興元年中秋之後由吉水前往臨安，就是舟行贛江水路至豐城縣或樟鎮後，捨舟登陸，走第一條路線經撫州至安仁縣接東西陸路交通幹道前往臨安。同一年，周必大由臨安返回廬陵，由信州舟行信江水路後，本欲走第一條路線於安仁縣改走陸路，經撫州、臨江軍南下，但因故改走第二條路線於貴溪縣捨舟登陸，經建昌軍至寧都縣，後再走水路返回廬陵。另外，紹熙三年，江東轉運副使楊萬里由建康府行部往返信州「決讞死囚」時，也選擇了一條

²⁶⁴ 參見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165-183。

翻越河流水系間丘陵山地（鄱江與信江間）的水陸相兼交通路線，先由建康府陸行至徽州，取祁門路至閭門外，後登溪船舟行昌水而下，於浮梁縣境捨舟登陸，經樂平縣翻越懷玉山脈至弋陽縣境，再接東西陸路交通幹道至信州，之後由信州舟行信江—鄱陽湖—長江返回建康府。²⁶⁵

為了避開航行條件不佳的袁江水路，許多行旅會在臨江軍轉換交通方式，如前述朱熹於乾道三年由湖南經袁州返回崇安，以及范成大於乾道八、九年由蘇州經袁州前往廣西，皆在臨江軍銜接贛江水路與東西陸路交通幹道。峽江縣則是另一轉換地點，孫覲在紹興二年（1132）前往象州，就是先走陸路循信江北岸東西交通幹道、接第一條路線至新淦縣後，舟行贛江南下，於峽江縣捨舟登陸，西北行至新喻縣接東西交通幹道。²⁶⁶

而翻越分水嶺的水陸相兼交通方式仍持續為跨境長途行旅及貨物運送所採行。如前所述，真宗以後，嶺南的「金銀、香藥、犀象、百貨」等皆陸運至南安軍或虔州後，再水運北上開封，明確記載海外大宗貨物以水陸相兼的方式，由嶺南陸運翻越大庾嶺後，再以水運運送至北方。由於這段路程「唯嶺道九十里為馬上之役，餘皆篙工楫人之勞」，因此北宋時大多數長途行旅皆循此往來汴京與嶺南：「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²⁶⁷紹聖元年，蘇軾由定州赴嶺南貶所，就是循此路線南下，於陳留縣登舟，至虔州或南安軍後才出陸翻越大庾嶺進入嶺南。²⁶⁸ 宋廷南遷之後，信江與錢塘江成為往來臨安的主要水路交通線之一，陸行越嶺以銜接水路是行旅必須採行的交通方式。不同於李翱是在玉山縣與常山縣轉換交通方式，此時行旅大多在更下游與行政層級更高的信州與衢州（或婺州、嚴州）轉換交通方式，陸行越嶺路線除舊有的常山—玉山路外，還新增了江山—永豐路。如周必大於隆興元年由臨安返回廬陵時，就是在嚴州捨舟登陸，經壽昌縣、龍游縣至衢州後，因「聞常山道中溪漲無舟，遂行江山路」至信州，並於此登舟順流而下。²⁶⁹

²⁶⁵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34-35，〈詩·江東集〉，頁1723-1829。

²⁶⁶ 孫覲，《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35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鈔本影印），卷13，頁386-393。

²⁶⁷ 余靖，〈韶州真水館記〉，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25冊，頁50；蘇軾，《蘇軾文集》卷17，頁519。

²⁶⁸ 蘇軾，《蘇軾文集》卷37，頁1042-1043；蘇軾，《蘇軾詩集》卷37-38，頁2028-2071。

²⁶⁹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5，〈歸廬陵日記〉，頁421-423。

整體而言，南宋時期江西水路與陸路聯結得更為緊密，行旅更頻繁地採用水陸相兼的交通方式。這一方面與穿越丘陵山區的道路逐漸完善有關，更重要的是江西橫互在首都臨安與荊湖、巴蜀、嶺南之間，中央與這些地方的大批人員與貨物往來經此而過，士人商旅絡驛於途，帶動對便捷交通路線的需求與利用。

柒・結語

相較於東晉南朝時期，唐五代時期，江西水路交通最顯著的變化是在鄱陽平原上出現水路縱橫的狀態，這主要是由於鄱陽湖的形成與擴張所致。新形成河湖交錯的水文環境（擔石湖與贛江、信江、鄱江入湖汊道）在平原上初步構成以星子鎮、洪州與餘干縣（鄔子口）為頂點的三角形水路交通網。三者之間皆有水路直接相通，並各自向外連接一條水路，北經彭蠡湖，接長江、大運河（南北主要水路），通往長江流域各地與中原；西南走贛江中、上游，越大庾嶺，接北江水路，通往嶺南；東南走信江，越玉山嶺，接錢塘江水路、大運河（南北主要水路支線），通往兩浙與中原，形成三個三叉或多叉路口。其中，星子鎮與洪州之間的彭蠡湖—贛江下游主泓道為南北主要水路所經，另一水路彭蠡湖—贛江吳城山汊道於唐後期才形成，為前者的替代路線。而洪州與餘干縣之間東西向的贛江趙圍汊道—擔石湖—信江鄔子港汊道則在唐中期開始成為南北主要水路支線所經，兩者逐漸分擔贛江下游主泓道的交通運輸功能。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形勢暫時改變了此一交通格局，楊吳、南唐政權與吳越政權分立，使得信江與錢塘江水路不再連通，贛江趙圍汊道—擔石湖—信江鄔子港汊道暫時喪失原有交通南北的功能。而贛江主泓道與吳城山汊道則仍持續發揮跨地域交通的作用，連結楊吳、南唐政權的核心首都金陵與外圍領地江西。然而由於河湖交錯的水文環境形成不久，湖泊的擴張與入湖汊道的發育仍在持續，尚未成為穩定航線，三角形水路網僅俱雛形。

到了宋代，隨著鄱陽湖的擴張，入湖汊道進一步發育，開始成為穩定的航道，承擔主要的航運功能，三角形水路網逐漸完善。雖然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形勢已不復存在，北宋時期的南北水路交通並未完全恢復至唐中後期的狀態。大運河—長江—贛江仍舊作為全國南北主要的水路交通線，但經過鄱陽湖湖區的航線已有所改變：贛江吳城山汊道取代贛江主泓道成為主要航行的河道，後者則因航道較為迂遠而退居次要，多於秋末春初的枯水期發揮作用。而贛江趙圍汊道—擔

石湖—信江鄔子港水路則轉為浙贛之間的區域航線，不見有循此水路進行南北長途移動的記載。到了南宋，境內東西橫向交通變得極為重要，作為臨安往西與長江中上游、嶺南往來最便捷的東西向水路，贛江趙圍汭道—鄱陽湖—信江鄔子港水路成為臨安通往嶺南與湖南的主要水路交通線；南康軍與餘干縣之間的水路（鄱陽湖—信江鄔子港、鄱江）則成為另一條連接長江水路，通往長江中上游的水路交通線。而贛江吳城山汭道—鄱陽湖水路由於向北連結長江水路，仍舊是境內主要的南北水路交通線之一。三角形水路皆成重要的水路交通線，就此而言，由於帝國版圖的變動與政治中心的轉移，鄱陽湖及贛江、信江等入湖汭道所形成的三角形水路網成為南宋水路交通無法忽略的重要樞紐，大批舟船經此通往南方各地。徐照很形象地描述這樣的情景：「港中分十字，蜀廣亦通連」，²⁷⁰ 河湖交錯的網路匯聚了各方的行旅商賈，舟船絡驛不絕於途。

在鄱陽湖水文環境變遷的影響與制約下，唐宋時期江西水路交通的發展受到全國政治經濟格局變化所牽動。隨著經濟重心的東南移，唐中期以降，彭蠡湖—贛江主泓道（宋時為吳城山汭道取代）—贛江中上游成為南北主要水路交通線的組成航段。透過這條航線，「軍實萬艘，浮江而下」，²⁷¹ 連結長江—大運河水路，將江西的物資與糧食源源不絕地運往北方的政治中心。即使在分裂時期（五代十國、南宋），這條航線也持續輸送上供米、木材等大宗物資，經長江—江南運河水路運至南方政治中心所在的長江三角洲與邊境前線。紹興初年，贛江吉州段就已布滿漕船，「四十萬之輸將，舳艫蔽水」，將大量品質較佳的「晚禾米」外運。²⁷² 大宗物資的流通並非只是單向流出，如淮鹽與糧食等亦循此航線反向輸送至江西諸州。大批的物資流動除了反映江西經濟的興起，亦顯示這一航段是唐宋帝國經濟動脈的重要一環。相對而言，東西向的贛江趙圍汭道—鄱陽湖—信江鄔子港汭道—信江中上游水路航運，雖因東南地區的持續開發而有所發展，但在唐中後期與北宋時期，這條航線經錢塘江—江南運河是作為南北主要水路交通

²⁷⁰ 徐照，《芳蘭軒集》卷1，〈過鄱陽湖〉，頁29。

²⁷¹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0，〈申請一·申免移軍治狀〉，頁911。引余致堯〈新創利民橋記〉所載張齊賢語。

²⁷² 按：在北宋前期早稻傳入後，江西原本生產的「晚禾米」由於品質較好因而成為官方稅賦徵收的標的。到了南宋，為供應前線軍糧，更進一步「和糴」大量的「晚禾米」，形成「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的狀態。李正臣，《大隱集》卷5，〈啟·吳運使啟〉，頁137；吳修安，〈唐宋時期江西地區森林的分布與演變〉，鄭阿財、汪娟主編，《張廣達先生九十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2），頁943-945。

線的支線，部分行旅循此進行南北長途移動，或區域間往來，並非是交通幹道。宋廷南遷臨安改變原有政治地理格局，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物資輸送、人員往來與訊息傳遞轉而以東西向為主。由於此航線經錢塘江水路可直抵臨安，且航線位置有利於中央與荊湖、嶺南間的交通往來，成為長江以南最重要的東西向水路。而鄱陽湖東側的另一條東西向水路：鄱陽湖—鄱江，則因串連臨安與長江中游水路亦成為重要的東西向水路，由臨安走陸路經徽州至閭門後，登舟循此航線通往長江中上游，「羽檄之交馳，貢輸之絡繹，賈鬻之流通，憧憧往來」，²⁷³ 替代了長江下游水路的部分交通運輸功能。對南宋朝廷而言，這兩條航線較長江下游水路便捷，且遠離北方敵對勢力的威脅，因此可說是帝國維持運作與事關生存的戰略交通線。

另一方面，江西水路交通發展的影響還體現在地域空間的變化與吳城山龍王信仰的傳播。伴隨著東南地區的經濟開發，唐中期至北宋前期，江西地區陸續增置了許多州縣，其中統縣政區由 7 個州增加為 13 個州軍，在新置的 6 個州軍中，有 4 個與水路交通的發展有關。北宋前期，南康軍、臨江軍與南安軍的建置與三者皆位在鄱陽湖—贛江下游主泓道（後為吳城山汊道取代）—贛江中上游水路沿岸，或地當江湖之會，舟船匯集，或地當水陸交通要衝，舟車輻輳有關，²⁷⁴ 這反映中央對交通要道與經濟動脈的重視和掌控。鄱陽湖—贛江一線沿岸相對集中設置了近半數的州軍治所，顯示該狹長空間為唐宋時期江西地區的發展軸線。而信州的設置與發展則和信江流域水陸路交通發展相關。唐中期，因信江流域「川源竄遠」、「地相去濶遠，山水迴合」的情況，甚至對舟行信江的行旅造成危害，「羣盜潛藏，舟行船泝，人不自保」，²⁷⁵ 先後增置信州、貴溪等州縣以加強控制。此後信江水路雖成為南北主要水路交通線的支線，但信州仍被視為「左僻」之地。直到南宋遷都臨安，信江水路與北岸陸路成為最主要的東西向水

²⁷³ 咸淳《臨安志》卷 21，〈疆域六·橋道·於潛縣〉，頁 591。

²⁷⁴ 南康軍因「星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軍實萬艘，浮江而下」匯聚於此，於太平興國三年（978）先升為縣，七年（982）後建為軍。臨江軍「以蕭灘之地當南粵、虔、吉、袁、洪四會之衝」，「舟車輻湊」，於南唐昇元二年升為清江縣，後在淳化三年建為軍。南安軍則於淳化元年（990）建為軍，「以便輦運」，咸平五年，嶺南香藥就是由南安軍「泛舟而北」。脫脫等，《宋史》卷 431，〈孔宜傳〉，頁 12814。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34，〈江南西路·臨江軍〉，頁 1470，1472-1473；卷 36，〈江南西路·南安軍〉，頁 1537。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2，真宗咸平五年七月，頁 1143。

²⁷⁵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7，〈江南西道五·信州〉，頁 2148, 2155。

陸路交通線之一，信州重要性迅速增加，成為「要衝之會」與「通要」，²⁷⁶ 改變了原先江州作為中原王朝進出江西門戶的空間格局。

吳城山龍王信仰也隨著水路交通的發展，循著航線被舟人水手們帶到鄱陽湖湖域之外。從目前所見祭祀吳城山龍王的祠廟分布，推測傳播路線有三：一是沿贛江水路至中上游，據載北宋後期虔州有三座吳城山龍王廟的別祠，其中在州城西北隅的別祠「尤絕顯異」，而被朝廷賜予廟額「神惠」。²⁷⁷ 二是沿信江水路至中上游，如前所述在弋陽縣有一座「彭蠡順濟龍王別祠」，應是由鄔子寨的龍王廟傳播而來。三是沿長江水路至長江三角洲，鄱陽湖口兩側的江州城與湖口縣各有一座祭祀吳城山龍王的龍王廟，²⁷⁸ 前者在長江沿岸，後者是鄱陽湖舟船進出長江的門戶，是吳城山龍王信仰向外傳播的最初據點。而目前所見唯一不在江西境內的吳城山龍王別祠則在江南運河畔的常州，據載政和六年（1116）被朝廷賜予廟額「靈濟」，²⁷⁹ 該廟的存在顯示江西與長江三角洲之間有頻繁的舟船往來，不僅運送人員與物資，也帶來江西的風俗信仰。

唐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變動與江西水路交通發展之間的關係並不止於此，特別是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南移，包括江西在內的東南地域逐漸成為帝國最發達富裕的地區，江西水路交通的繁忙程度與重要性已不可同日而語，其間的關係當更為複雜。尤其是南宋時期，興盛的商貿活動以及強烈的糧食需求必然大量利用水路進行運輸，這對帝國的政權維繫與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然而受限於史料特性（相對於士人行記，相關資料較為分散），本文對此尚未進行充分的考察，希冀未來能在本文的基礎上有更完整的分析討論。

（本文於民國一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收稿；一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²⁷⁶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21，〈江南東路·信益〉，頁 949。

²⁷⁷ 汪藻，《浮溪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958-1961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卷 18，〈記·虔州神惠廟記〉，頁 207-208；《宋會要輯稿》禮 20，〈諸祠廟〉，頁 1059。

²⁷⁸ 子澄，《江州志》（收入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祠祀志·神廟〉，頁 1650, 1657。

²⁷⁹ 《宋會要輯稿》禮 20，〈諸祠廟〉，頁 105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孔武仲撰，聶言之點校，《宗伯集》，收入《豫章叢書》集部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 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篇（三卷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編（十卷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
- 王安石撰，聶安福、侯體健、趙惠俊整理，《臨川先生文集》，收入《王安石全集》第5-7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 王阮，《義豐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63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宋淳祐三年刻本影印。
- 王庭珪，《盧溪先生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3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嘉靖五年刻本影印。
- 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道光二十九年懼盈齋刻本影印。
- 王補、曾燦材等纂修，民國《廬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民國九年刊本影印。
-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朱長文纂輯，何立民點校，《墨池編》，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 朱熹撰，劉永翔、朱幼文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第20-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江少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余之禎纂修，萬曆《吉安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據明萬曆十三年刻本影印。
- 吳曾撰，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能改齋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集》，收入《呂祖謙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 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宋之問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 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
- 李正臣，《大隱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36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影印。

- 李白撰，安旗等注釋，《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0。
- 李白撰，瞿蛻園、朱金誠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複製重印。
-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據宋刊本配明隆慶胡惟新刊本影印。
- 李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李綱，《梁溪先生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36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道光刊本影印。
- 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等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汪藻，《浮溪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958-1961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
-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48-50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澹生堂鈔本影印。
-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周敦頤著，陳克明點校，《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
- 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官撰，楊正泰點校，《寰宇通衢》，收入《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岳珂編，王曾瑜校注，《鄂國金佗稗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林庭樞、周廣纂修，嘉靖《江西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2-183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洪咨夔著，侯體健點校，《洪咨夔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 洪适撰，凌郁之輯校，《盤洲文集》，收入《鄱陽三洪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

吳修安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吳船錄》，收入《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驂鸞錄》，收入《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

計有功撰，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唐詩紀事》，北京：中華書局，1965。

韋莊著，聶安福箋注，《韋莊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孫覲，《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35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鈔本影印。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徐鹿卿撰，郭曉雲點校，《清正存稿》，收入《豫章叢書》集部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徐照撰，趙平校點，《芳蘭軒集》，收入《永嘉四靈詩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真人元開著，汪向榮校注，《唐大和上東征傳》，北京：中華書局，1979。

翁卷著，余力箋注，《翁卷集箋注》，北京：線裝書局，2009。

翁卷撰，趙平校點，《葦碧軒集》，收入《永嘉四靈詩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北京：中華書局，2004。

區作霖纂修，同治《餘干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

康河修，董天錫纂，嘉靖《贛州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38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2，據明嘉靖十五年刻本影印。

張孝祥著，辛更儒校注，《張孝祥集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

張舜民，《畫墁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948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

曹彥約，《昌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篇》，北京：中華書局，1983。

許及之，《涉齋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61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影印。

郭祥正撰，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合肥：黃山書社，1995。

陳舜俞，《廬山記》，南宋紹興間刊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陳霖修，陳徵等纂，正德《南康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3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據明正德十五年刻本影印。
- 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陸游撰，李昌憲整理，《入蜀記》，收入《全宋筆記》第 5 編第 8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
- 喻良能，《香山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56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影印。
- 彭汝礪，《鄱陽先生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2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鈔本影印。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程秘，《程端明公洺水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71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費宏撰，吳長庚、費正忠校點，《費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馮曾修，李汛纂，嘉靖《九江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36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2，據明嘉靖七年刻本影印。
- 黃次山，《三餘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39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宜秋館刻本影印。
- 黃庭堅撰，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 黃芻編，曹清華校點，《山谷年譜》，收入《宋人年譜叢刊》第 5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
- 黃德溥等修，褚景昕等纂，同治《贛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同治十一年刻本民國二十年重印本影印。
- 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
-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內府原刊本影印。
- 趙不悔修，羅願纂，李勇先校點，淳熙《新安志》，收入《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甲編》第 8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 趙抃，《趙清獻公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6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汪旦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影印。
- 趙師秀撰，趙平校點，《清苑齋詩集》，收入《永嘉四靈詩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 趙蕃，《乾道稿》，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260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

吳修安

- 趙蕃，《淳熙稿》，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257-2259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
- 趙蕃，《章泉稿》，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026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
- 劉辰翁撰，萬萍點校，《須溪集》，收入《豫章叢書》集部五，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 劉長卿，《劉隨州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235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據畿輔叢書本排印。
- 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 劉弇撰，劉宗彬點校，《龍雲集》，收入《豫章叢書》集部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樓鑰撰，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歐陽駿等修，周之鏞等纂，同治《萬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
- 潛說友纂，咸淳《臨安志》，收入《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 1-3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
- 獨孤及，《昆陵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659 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上海涵芬樓景印亦有生參校刊本影印。
- 謝旻等監修，雍正《江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3-51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韓偓著，齊濤箋注，《韓偓詩集箋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魏瀛等修，鐘音鴻等纂，同治《贛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
- 蘇軾著，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蘇軾撰，張志烈等校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釋貫休撰，陸永峰校注，《禪月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

釋惠洪著，釋廓門貫徹注，張伯偉等點校，《注石門文字禪》，北京：中華書局，2012。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二·近人論著

《江西省地圖集》編纂委員會編

2008 《江西省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孔凡禮

1998 《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

王元林

2008 〈贛水上源各河流名實考〉，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編，《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探索與新動向：慶賀朱士光教授七十華秩暨榮休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頁 164-172。

吳晶

2008 《永嘉四靈：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吳修安

2016 〈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2019 〈唐代江西地區的陸路交通——以驛路為中心〉，《白沙歷史地理學報》20：61-87。

2021 〈唐宋時期南北交通幹道新探——江西區域視角的考察〉，《國學研究》45：63-85。

2022 〈唐宋時期江西地區森林的分布與演變〉，鄭阿財、汪娟主編，《張廣達先生九十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893-951。

宋三平、張濤

2009 〈論兩宋江西地區的交通及其影響〉，《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0.6：98-103。

李之亮

2001 《宋兩江郡守替易考》，成都：巴蜀書社。

李仁生、丁功誼

2014 《周必大年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吳修安

李榮村

- 1969 〈黑風峒變亂始末—南宋中葉湘粵贛間峒民的變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3：497-533。

沈興敬主編

- 1991 《江西內河航運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南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 1997 《南昌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泰和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 1993 《泰和縣志》，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

- 1927 《江西省五萬分一地形圖》，臺北：內政部圖書館藏，「滁槎」圖幅。

張錦鵬

- 2008 《南宋交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家齊

- 2005 《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

梁庚堯

- 2010 《南宋鹽榷》，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淺見洋二

- 2011 〈黃庭堅詩注的形成與黃蓍《山谷年譜》——以真跡及石刻的利用為中心〉，周裕鍇編，《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頁 377-398。

清江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 1989 《清江縣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許懷林

- 1988 〈“舟船之盛，盡于江西”——歷史上江西的航運業〉，《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 1 期：15-21。

- 1993 《江西史稿》，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 2008 《江西通史·北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09 《江西通史·南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陳金鳳

- 2008 《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傅璇琮、李一飛、陶敏

- 2012 《新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中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

新淦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0 《新淦縣志》，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

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 《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鄒錦良

2013 《周必大生平與思想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黎傳紀、易平

1998 《江西方志通考》，合肥：黃山書社。

蕭東海

2007 《楊萬里年譜》，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譚其驤主編

1982 《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嚴耕望

1985 《唐代交通圖考（序言・總目・第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吳修安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in Jiangxi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Poyang Lake and Its Waterway Network

Xiu-an W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On the basis of re-explor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Poyang Lake, the present article investigates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in Jiangxi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hich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wo factor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 former was the formation and expansion of Poyang Lake, which changed the hydr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Qiaoyang Plain, with the newly formed lake and its river delta system becoming the geograph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the latter was the change in the location of state-level transportation, namely that the political center gradually moved southeast from Chang'an to Kaifeng and finally to Lin'an,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advantages of Jiangxi's transport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the hydrology of the rivers and lakes between Hongzhou and Raozhou had initially formed a waterway network. Among them, the route of Danshi Lake to the main stream of the Gan River and the route of the Wuzigang River (tributary of the Xin River) to Danshi Lake and to the Zhaowei River (tributary of the Gan River) became two north-south transportation waterways. Moving to the Northern Song, the route of Poyang Lake to the Wuchengshan River (tributary of the Gan River) replaced them; however, after waters subsided, the main stream of the Gan River still served as the main waterway for shipp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the capital was moved to Lin'an, and the Wuzigang-Poyang-Zhaowei route increased in importance, becoming one of the main routes of east-west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Ultimately, a triangular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network of Nankang Military Prefecture, Longxing Prefecture, and Yugan County as the vertices was formed, which connected state-level water and land transportation, with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north, the Gan River in the southwest, and the Xin River in the southeast. The ebb and flow with the seasons of Poyang Lake greatly affected the navigation of the waters in the area. When the lake water rose in late spring and early autumn, the turbulent waters could endanger safety, forcing boats to avoid the waterways. As the lake water receded

in late autumn and early spring, reduced water levels in the tributaries meant boats could not pass. With that said, conditions in the upper and middle-lower reaches of the Gan River differed.

Key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Jiangxi;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Poyang Lake; Gan River